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传统下的毛泽东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他的思想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湖南是他的故乡，因此，他的思想又深深地打上了湖湘文化的烙印。

现代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史前时代（文字发明以前）就已在东亚大陆形成了“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原始文化景观。从炎黄至秦汉，逐渐进入文明时代，并确立了以中原华夏为轴心和儒道互补、吐纳百家的中华文化格局。故经史典籍，历来将黄河水系的中下游视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策源地。

《尚书·禹贡》将全国分为九州，湖南属荆州南境。春秋战国属楚。荆楚虽则疆域辽阔，兵力强盛，但中原王朝仍视之为荆蛮楚蛮。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其中有长沙郡与黔中郡。及唐广德二年，置湖南观察使，自是始立湖南之名。

{ewc MVIMAGE,MVIMAGE, !09101200\_0002\_1.bmp}

在古代，湖南人物鲜见经传，独有屈原放逐、贾谊贬谪至此而留下奇瑰的辞赋，因之杜甫有“湖南请绝地，万古一长嗟”之咏叹。提起湖南，就不禁令人为屈贾而伤心落泪。这种凄凉的景况直到近代海通以后，才洒然一变。以前，是中原文化逐渐向南推移，湖南属于被开发的地带。海通以后，则是南方得风气之先，其影响逐渐向北方渗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湖南在中国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太平军起事以后，湘军的崛起，对满汉势力的消长和湘楚人才的涌现是一个重要契机。

湘军的崛起，其直接作用是扑灭了太平军，暂时缓解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但从长远来看，却是为清朝的覆灭准备了掘墓人。掘墓人可分两线，其一是统领湘军、淮军与北洋军的汉族官僚，他们既是镇压太平军的主将，又是洋务运动的首倡者，形势的发展使他们的后继者——北洋军阀得陇望蜀，从分享权力逐渐演变为觊觎最高统治权。其二是甲午海战以后，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奋起救亡的新人。特别是在湖南，湘军诸将创立的基业，转化为下一代“修学储能”的有利条件。他们一旦羽毛丰满，便会乘时御风，与祖辈分道扬镳，成为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先锋，维新运动的首倡者是南海康有为，而激进派代表谭嗣同、唐才常则是湖南到阳人。辛亥革命的首领孙中山是广东香山人，而继起者则有湖南的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五四运动的主帅是陈独秀，而湖南的毛泽东与蔡和森则是后起之秀。“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鸦片战争打开海禁至今已逾一个半世纪，湖南人才蔚起，至毛泽东而称极盛。毛氏在《沁园春·雪》中写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古代帝王已被滚滚洪流席卷而去，新时代的英雄人物合当应运而兴。毛泽东创大业，开新统，就时代条件而言，他的革命思想萌发于五四时期，面对着封建礼制秩序解体与帝国主义战争灾难的双重危机，他与同时代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样，选择了俄式革命道路，但他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又敢于顶住俄式教条主义的压力，独立地开闢了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赢得了1949年的全国胜利。就其主观条件而言，他自幼好学深思，博览经史，深得“实事求是”之要旨，又富于独立根性，既醉心于谭嗣同的“心力说”，亦钟情于屈骚的浪漫主义精神，其得力于湖湘文化之熏陶者，盖亦特为深厚，本章拟就此举要加以说明

## 一 屈骚情怀

毛泽东青年时代就养成了“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习惯，喜欢在读过的书籍上作批注，坚持写课堂笔记和读书心得。他早年批阅过的书籍和撰写的笔记、日记很多，带回韶山冲老家的就有一大网篮。1927年马日事变之后，族人为了防备反动派的搜查，把它搬到山后烧掉。他的塾师毛宇居不忍心，从火中救出一本课堂笔记，现在成了珍贵的历史文物。

笔记用的是九行直线本，共47页（94面）。前面11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后面36页题名《讲堂录》，主要是“修身”和“国文”的笔记，当是1913至1914年听杨昌济与袁仲谦两位老师讲课时所记。

《离骚》和《九歌》系全文抄录，一笔不苟，可见爱好之深。

如众所周知《离骚》和《九歌》都是屈原的代表作。屈原生活在战国中后期的楚国，正当国势积弱变衰的转折关头。作为宗室贵族的一员，他在楚怀王时曾担任过仅次于令尹的要职左徒。他主张修明法度，选贤任能，实现富国强兵，对外联齐制秦，这些进步主张曾一度得到楚怀王的支持，但不久便遭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等人谗毁，被黜为三闾大夫，流放汉北，顷襄王时，再度流放江南。因忧伤国事，发愤作为辞赋，倾诉其眷念祖国和人民的情愫。后秦楚交兵，楚接连丧师失地，怀王入秦不返，郢都亦遭残破，他怀着满腔的哀怨和愤怒，自投汨罗江而死。而其高远的理想、卓绝的人格及其所经历的种种历史巨变与心灵上的波卷澜翻，便集中反映在那些优美卓绝的辞赋之中。

{ewc MVIMAGE,MVIMAGE, !09101200\_0006\_1.bmp}

## （二）浪漫主义的悲剧

《九歌》是屈原采用楚国民间祭神祀鬼的歌曲为原始材料，经过艺术加工而写成的作品。全套歌词，具有浓厚的浪漫气息，充满神话色彩和优美想像，是屈原的重要作品之一，但与屈原本身的遭际无直接关系。

《离骚》题意为“遭逢忧患”，是屈原自叙自诉之作。全诗二千余字，约分为三大段：第一大段，叙述自己志洁行芳的品格和修养，辅佐楚王励精图治的奋斗努力，适后遭谗被疏的原委，并揭露楚国的黑暗现实与政治危机。第二大段，通过神话传说和超现实的手法，假托男女恋情，抒写自己追求理想而不可得的矛盾痛苦心理。最后一段，借助求神问卜来摆脱苦闷，却得出了楚国不可久留的结论，因而飘然远引，开始幻想的漫游。但爱祖国、爱人民的强烈感情战胜了远适异国的幻梦。一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终于决心以生命殉祖国、殉理想。全篇曲折变幻，波澜迭起，而贯串其间的一条主线，则是诗人内心世界的矛盾与冲突。这条主线又展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诗人的理想与现实环境的矛盾；其二是诗人远游自疏的心态与眷恋故国之情的矛盾。两者互相纠结而构成诗人心灵上的悲剧性冲突，整个诗思便以浪漫主义手法扣紧冲突而逐步展开。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现实主义着重于对客观世界的具体如实的描绘，它以客观现实生活为主要的反映对象；而浪漫主义则侧重于直接表现自己的主观世界，充分揭示自我的精神面貌，抒发内心的种种矛盾。《离骚》所展示的悲剧，既是屈原内心世界的悲剧性冲突；也是统治集团中个别先觉者与整个腐朽势力发生冲突而酿成的悲剧。

## （三）“骚之苗裔”

艺术创作，“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鲁迅）唐代的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诗，宋代的辛（弃疾）词，都是屈骚的继承和发扬。杜牧《李长吉歌诗序》说：“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毛泽东终身酷嗜屈骚，兼爱三李诗与辛词。更难得的是，他自己又是一个洋溢着屈骚情怀的浪漫主义诗人。

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毛泽东就有《挽易咏畦》（1915年）和《送纵宇一郎东行》（1918年）等诗作。后一首诗并有句云：“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明显地追踪屈骚遗响。至于他后来的诗词，更是充满着奇诡的想像和意境，在他正式发表的五十首诗词中，就有二十二首化用了各种神话传说，创造出一种独特的革命浪漫主义风格。

当然，毛泽东的创造活动决不限于诗的艺术世界，他更善于在政治、军事等现实世界中自由驰骋。在他的生命历程中，虽然也有像屈原那样横遭贬谪的倒霉时刻，但从全过程来看，却是冲波逆折，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一曲凯歌。诗词的艺术世界与政治的现实世界既有距离又有相通之处。屈骚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激励着他的战斗生涯，成为他席卷神州江山的内驱力，这是无疑的。到晚年，浪漫主义精神又被极度夸大和扭曲，甚至演变为发动“大跃进”和“文革”狂澜的深层心理基因。这个问题学术界目前鲜有涉及者，尚待作进一步的开掘。

{ewc MVIMAGE,MVIMAGE, !09101200\_0009\_1.bmp}

## 二 湘学主流

### （一）朱张遗绪

{ewc MVIMAGE,MVIMAGE, !09101200\_0010\_1.bmp}

湖南传统学风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宋代的湖湘学派。北宋末年中原战乱，士人纷纷南下湘楚。胡安国、胡宏父子在衡山创建碧泉书堂、文定书院，开湖湘学统之先河。继而张 先后主持城南书院与岳麓书院，朱（熹）张（ ）会讲于岳麓，奠定了湖湘学派的基础。

湖湘学派以岳麓书院为中心，在长期发展中，虽迭有兴衰消长，但却培养了自己的独特学风，其一是奉程朱理学为正宗。胡安国本是二程的再传弟子，朱熹较安国晚出两辈，但却历来被奉为程氏正传。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张拭主讲岳麓书院时，理学家朱熹自闽来访，交流学术思想，当时慕名前来听讲的人很多，以至“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朱张岳麓会讲既有学术讨论的特色，又有学术交流的成效。由于闽学与湖湘学都是理学的苗裔，张 与朱熹会讲不但加深了两位学者之间的友谊，而且促进了两个学派的交流与融合，他们的满门桃李，代代相传，进一步保持了理学在三湘的正统地位。事功学派代表陈亮和心学宗师王阳明虽曾过此讲学，但其影响有限。至清代乾嘉汉学风靡全国，独在湖南受到理学传统的抑制，并未成为主流。其次是提倡实学，张 是湖湘学派的奠基人。他的本体论带有某些心学色彩，但在认识论上，主张“行得便见得”，“士君子之学，不过一实字。”朱熹曾大呼功利之学可忧可畏，而张 只是认为：“士龙（薛季宣）正欲详闻，其为人事功，固有所当为，则喜字上煞有病。”（见《宋元学案·艮斋学案》）他肯定事功是应当做的，但应是“无所为而然”。“喜”字之病在于“有所为”，可见他对事功之学的态度与朱熹不同。张 作古以后，其弟子胡大时等归入陈傅良门下。陈傅良是永嘉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其学重“经

响那么深广，但在湖湘学派中却抹下了一层重视实学的色彩。

## （二）船山学脉

朱张以后，对湖湘学风影响最深的莫过于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他早年就学于岳麓书院，亦从理学入门。1644年闯王进京，明社颠覆、清兵入关，一连串“天崩地解”似的惊人变故，打破了王夫之科举入仕的梦想，推动他发动衡山起义，抗击清兵南下。南明败亡后，他在转徙于湘西山区的流亡生活中，察看了瑶族的社会状况，体会了底层人民的疾苦。其后发愤著书。以“坐集千古之智”的宽阔胸怀，吸取和消化了前人留下的大量思想资料，又“喜从人间问四方事”，深入研究从现实生活中获取的感性知识。他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穷毕生之精力，完成了一百余种、四百余卷空前宏富而又别开生面的学术著作。

王夫之继承了张载、朱熹的理学遗产，又吸取了东林学派“学为世用”的精神，对理学作了札判性的总结，建立了“理依于气”“器体道用”“知行相资”的哲学体系。在史学方面，他提出了理势统一的历史观，把历史当作一个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并批判了“言必称三代”的泥古观念，强调读史不仅要“知治知乱”，而更主要的是“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他突出地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其思想体系已经超越宋明理学，而成为近代启蒙思想的重要源泉之一。

王夫之隐居深山瑶洞，刻苦钻研学术近四十年，他的著作藏之深山，直到康熙年间，才由次子王 刊刻了十余种。道光年间，邓显鹤、邹汉勋首次辑印《船山遗书》一百五十卷。同治四年，曾国藩设金陵书局，刻印《船山遗书》凡二百八十八卷。由是而船山之学日益昌盛。戊戌时期儒者欧阳中鹄自号“瓣姜”，取意于王夫之的号——姜斋。他的学生谭嗣同、唐才常都从船山学说吸取力量，成为维新运动激进派的代表人物。谭嗣同称“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仁学》）他把船山学说当作维新运动的理论源泉。后来的辛亥革命志士也大都 王夫子泽被湘湖好读《船山遗书》，从弘扬民族大义出发而走上革命道路。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毛泽东，青年时就在老师杨昌济的启发下研读过船山遗著。建党以后，并以“船山学社”为基地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为湖南和中国革命事业培养了一代新人。

{ewc MVIMAGE,MVIMAGE, !09101200\_0013\_1.bmp}

## （三）“师夷长技”

如果说，王夫之通过批判和总结古代文化给后人以深刻启迪；那么，魏源就以提出“师夷长技”而揭开了近代文化的序幕。魏源的一生跨过鸦片战争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魏源早年就读于岳麓书院，好经世致用之学。后从刘逢禄那里学了以“微言大义”为特色的公羊学，常引古筹今，议论时政。早在鸦片战争前夕，他就尖锐地指出，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一途”。同时，他又抨击在湖湘影响最深的宋学，只是满口“心性”“礼义”，但却“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无一事前效诸民物”。他呼吁关心社会现实，提出“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古微堂文集》）。

魏源没有做过高官，但却相继为贺长龄、陶谢等大员幕僚，有机会大量接触并参与处理农政、刑名、河工、漕运、盐法等实际问题，从而成为名重

文编》，使“以经术为治本”的方针得以广其流传。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破门而入，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在这个时期，正如魏源所指出的：“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魏源正是这种慷慨陈词、讲画御侮的著名爱国志士，他自称“荆楚以南”的“积感之民”，著《圣武记》，记述清王朝的一些重大军事活动，力图藉此激励当局者振兴武备，抵御外侮。同时，他又根据形势的需要，将他讲画的重点转向于学习西方。他穷十年之力，编写了《海国图志》，打破“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传统观念，向人们展示了广阔的世界图景。在自叙中，他还强调，此书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他进而把是否了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学习其科学技术方面的长处，提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者的高度来认识。“欲制夷患，必筹夷情”“不善师夷者，外夷制之。”魏源将经世的重点转向于“师夷长技”，这是一个重大转变。它引起了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巨大震荡，打开了通向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闸门，在湖南士子中，其影响尤为深广。

#### （四）取融西学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集团，不但在政治军事方面举足轻重，而且在学术方面也具有转移风气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要看到他们继承了湖湘的理学传统，抱有强烈的卫道意识。曾国藩早年就学于岳麓书院，接受系统的经学教育和湖湘学风的熏染。1840年他到翰林院任职以后，开始师事理学家唐鉴、倭仁，由此一心崇奉程朱理学，每天写修身日记，以“抱道君子”自命。太平军兴，他忧心如焚，在《讨粤匪檄》中宣称：“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代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曾氏不忍见洪杨坐大，最根本的是因为在太平天国治下，“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因此，他领导湘军对太平军的战争并不仅仅为了保卫清朝的统治，更重要的是为了保卫传统文化命脉，征伐异教。正是从这种卫护圣教的使命感出发，他毅然投笔从戎，聚而组建湘军，誓死与叛道者作战到底，但曾氏不是空谈性理的腐儒，他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是理学经世派的主心骨。他早就意识到，单单讲求修身养性的“内圣”之道，难以实现他“治国”“平天下”的夙愿。因此，他于义理之中，又特为划分出一门“经济”之学。他认为儒者要兼通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门学问。义理是指导思想，经济是落脚之处。他自己认真研读过《孙子兵法》、魏源的《圣武记》、《皇朝经世文编》，并广泛涉猎诸子百家、历史地理以及兵农医艺诸书，以务实精神博览有用之书，这就为他往后领兵征战作了一定的知识准备。

曾国藩创建湘军时，本来是为了镇压太平军起义。屡战不胜，便引进“洋枪队”来助阵。通过战争实践，他认识到“夷人”的技术高强，非中国所能敌。为了应付变局，他审时度势，决心突破夷夏之大防，兼采西学之长，林则徐、魏源等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提出了“师夷长技”的主张，但遭到清廷的拒斥。待到道光、咸丰年间，内忧外患已逼得清皇室六神无主，曾国藩于1860年（咸丰十年）倡言：“驭夷之道，贵识夷情”，并把他提出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建议提到“救时第一要务”的高度，已渐能为清廷所宽容，由此而迈开了洋务运动的第一步。

随着洋务实践的发展，曾国藩认识到“洋人制器出于算学”，于是罗致

育视为“身心性命之学”，这就比他“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阶段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道光进士冯桂芬将他的《校庐抗议》一书寄请曾国藩作序，曾国藩在复信中说：“又蒙示以校庐大论四十首，属为序跋，细读再四，便如聆叶水心、马贵与一辈人议论……。”他把当时积极提倡西学的冯桂芬同古代提倡“实学”的叶适、马端临等人联系起来，由通经致用而转向于取融西学，沟通古今中西的线索，便是湖湘学派素有的务实精神。

曾国藩背负着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铸造了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但他又用实际行动第一个打开了学习西方的窗口，成为洋务运动的奠基人。捍卫传统文化，他是真诚的；接受西方文化，他是被迫的。“中体西用”模式，正是这种矛盾心情下的产物。

曾国藩兼重义理与实学的作风以及实际上由他创始的“中体西用”模式，在此后百多年中一直传承不绝，对湖湘学风的演变具有重要影响。一批一批的湖南人物脱颖而出，他们的思想虽代代不同，但却大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过这种学风的熏陶。

### 三 独立根性

#### （一）谭嗣同的独立根性

甲午战后，洋务运动宣告破产，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公车上书”为嚆矢，将变法维新提上了议事日程。湖南与北京、上海同为维新运动的主要阵地。推求其原故，不能忽视当时湖南的一批地方官都有不同程度的改革要求，为维新运动的兴起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更主要的是在野的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运动的激进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了王夫之的学脉和近代湖湘文化的独立根性与求实精神，因而敢于吸纳西学，冲决网罗，开创新局。

谭嗣同早岁攻读儒书，服膺船山之学。三十岁以后，才“究心泰西天算格致”。并撰著《仁学》，力图汇通中西，建立一种能融合中国古代文化而向近代转化的思想体系，这种体系虽将中学与西学生硬揉合而未臻成熟，但他却继承了船山的道器观而加以独特的发挥。他说“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器既变，道安得不变？……且道非圣人所独有也，尤非中国所私有也。……彼外洋莫不有之。”他毅然把洋务派所崇奉的“道体器用观”从根本上颠倒过来了。“器”上升为“体”，“道”转化为“用”，这样就一举推倒了古圣先贤对“道”的垄断权，也突破了曾国藩、张之洞等人所构筑的“中体西用”的精神防线，为思想解放和引进西方文化，开辟了

{ewc MVIMAGE,MVIMAGE,!09101200\_0019\_1.bmp}

广阔的道路。

但是，谭嗣同在北游访学以后，因受到傅兰雅所译《治心免病法》和佛学的影响，却片面夸大了“心”的作用。他在所著《仁学》中说：“自此猛省，所学皆虚，了无实际。惟一心是实。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将心力夸大到了极点。

既然心力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因此他便提出了“以心挽劫”的主张，“缘劫运既由心造，自可以心解之”。何以解之呢？一是靠慈悲之心的感化：“感一二人而一二人化，则以感天下而劫运可挽也。”再则是改造自心，即所谓“改造脑气筋之动法”。

“以心挽劫”是谭嗣同《仁学》的最终结论。戊戌政变，他壮烈牺牲以

谭嗣同的“心力说”极端夸大主观能动性，对南学会会员杨昌济及其门下诸生影响至为深远。

## （二）辛亥烈士的志节

维新运动失败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逐渐成为主流。有识之士，转向西方国家及东邻日本探求新知。当时湖南籍留日学生人数最多，参加革命活动也表现最为积极热情。黄兴之领导黄花岗起义，陈天华、杨毓麟之蹈海警醒国人，令举世为之震惊。他们的壮烈行动都与湖湘传统学风有隐密的内在联系。杨毓麟生前说过：“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时阳明学说遍天下，而湘学独奋然自异。自是学子被服其成俗。二百年来，大江南北，相率为烦琐之经说。而邵阳魏默深治今文《尚书》、三家《诗》，门庭敞然，及今人湘谭王氏之于《公羊》，类能蹂躏数千载大儒之堂牖，而建立一帜。道咸之间，举世以谈洋务为耻，而魏默深首治之。湘阴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垓，何论世法，其爱同胞而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己。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故吾湖南人之奴性，虽经十一朝之栽培浸灌，宜若可以深根而固蒂矣。然时至今日，几几乎迸裂爆散，有冲决网罗之势。”（湖南之湖南人：《新湖南》，载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18页）却同样贯穿着湖湘士人多年培育而成的“独立之根性”。

## （三）杨昌济承先启后

杨昌济是杨毓麟的同宗密友，幼小在长沙东乡板仓一起长大，以后又在长沙城南书院及日本和英国三度同窗。他们在维新时期思想极为接近，但出国留学以后，杨毓麟成了激进的革命派，杨昌济则致力于学术研究。1913年杨昌济学成归国，任教于湖南第一师范。他为学融中西于一炉。就其主要倾向言，中学仍居主导地位。而在中学中，他既深研程朱理学，又特别重视以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为代表的湖湘文化传统。1914年船山学社成立，他在日记中写道：“学社以船山为名，即当讲船山之学。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今者五族一家，船山所谓狭义之民族主义不复如前日之重要；然所谓

{ewc MVIMAGE,MVIMAGE,!09101200\_0022\_1.bmp}

《达化斋日记》曾在1920—1921年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是杨昌济1899年和1914—1916年的部分日记。1978年长沙出版之单行本，系根据一个手抄本进行整理的。

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其压迫之甚非仅如汉族前日之所经验，故吾辈不得以五族一家遂无须乎民族主义也。（杨昌济：《达化斋日记》）他力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王船山当年强调的民族主义转化为反对列强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

{ewc MVIMAGE,MVIMAGE,!09101200\_0023\_1.bmp}

杨昌济讲修身课，毛泽东的手书经常引据曾国藩的语录，他自己还手抄《曾文正公日记》《家书》。他在1914年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仍抄曾文正公日记，欲在一月以内抄完，亦文正一书不完不看他书之意也”。接着又在9月12日写道：“昨日将曾文正公家书抄完，颇自以为喜，已做成



记就可以看出，他的确奉曾国藩为师表，始终服膺无倦。

戊戌维新时，杨昌济曾参加南学会，受学于谭嗣同。《达化斋日记》有一段追忆当年他与谭嗣同的问对，笔端带有深厚的感情：“余研究学理十有余年，殊难极其广大，及读谭浏阳仁学，乃有豁然贯通之象。其序言网罗重重，与虚空无极，人初须冲决利禄之罗网，次须冲决伦常之罗网，终须冲决佛教之罗网。心力迈进，一向无前，我心随之，猝增力千万倍。”他深信谭氏的“心力说”，强调“人之力莫大于心，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总之，程朱心性之学；王船山的民族大义与独立根性；曾国藩的经世观念与务实态度；谭同同的“心力说”与冲决网罗精神……这些都是杨昌济思想的主要来源与组成部分。杨氏执教一师，又通过言传身教，把它耐心传递给毛泽东、蔡和森等一辈新人，为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论体系，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思想材料。

## 四 私塾发蒙

### (一) 韶山毛氏

九疑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毛泽东的这首《答友人》作于1961年。九疑山又名苍梧山，在湖南省南部宁远县城南六十里。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另据清光绪年间《湘潭县志》载：舜帝南巡时，路经韶山，听九韶乐，舜帝死后，他的两个爱妃——娥皇和女英追踪湘水，泪洒青竹而竹尽斑。“斑竹一枝千滴泪”，写的正是作者对故土的深情怀念和祝愿。

韶山（峰）又名仙女峰，高五里，是南岳第七十一峰，位于湘潭、湘乡、宁乡交界处。韶峰脚下的一个谷地，自南向北长十里，东西宽七里，称为韶山冲，冲里原先住着六百户人家，以毛姓为大族，杂有李、钟、周、邹、庞等姓。韶山落脉的小山丘，叫韶山嘴。在韶山嘴的对面（南岸）有一座一担柴式的土砖房子，叫上屋场，那就是毛泽东出生的地方。

毛姓在韶山落脚生根已有五百年历史。元朝末年，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反元。江西吉州府龙城县，有个叫毛太华的青年农民揭竿而起，参加了朱元璋的起义队伍。等到朱元璋谏灭群雄，建立明朝，毛太华已提升为“百夫长”，又随傅友德将军远征云南澜沧江（今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在那里立下战功，并娶妻安家，生下四个儿子，取名为清一、清二、清三、清四。后来毛太华请准告老还乡，但他没有返回原籍，而是落户到因战乱致人烟稀少的湖南。他带着两个儿子定居于湘乡县城北门外的绯柴桥，有几十亩田产。未久，清一和清四又移居到更为偏僻的湘乡七都七甲，即今日的湘潭韶山冲。

韶山毛氏家族自毛太华第七代孙修族谱，定下了二十代子孙家族谱为：

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祥；

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

自1737年至1941年的两百多年间，韶山毛氏曾四次修谱，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1823—1893）号四端，是太华公的十七代孙，他住在东茅塘，以种田、打柴为生，后来借债购置了一点田产，因债务愈背愈重，郁郁而终。泽东就是曾祖父去世那年出生的。泽东的祖父恩著（1846—1904）是祖人的次子，号翼臣。他于1878年同哥哥德臣分家时，从东茅塘搬到南岸上屋场，因家境更趋穷困，不得不将祖遗的部分田产典当出去。他死后葬于滴水洞大石鼓，这就是泽东小时候常来放牛，晚年还依恋不舍的那个“西方山洞”。恩著娶妻刘氏，生一子贻昌（1870—1920），字顺生，号良弼。

毛顺生读过几年私塾，虽然同祖上一样务农为业，但他为人精明能干，十七岁就开始当家理事。他娶妻文氏，生下五子二女。毛泽东就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前面两个都不幸在襁褓中夭折。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1867—1919）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长得中等身材，容貌端秀，圆脸庞，宽前额，有一双聪慧的眼睛。她没有读过书，连名字也没有取一个。她的娘家在湘乡四都唐家坨（现改称棠佳阁），与韶山冲隔一座云盘大山，相距十余华里。文氏耕读传家，家境小康。只因祖坟

将七妹许配韶山毛家。文七妹十三岁便与毛顺生订婚。毛顺生当时还只有十岁。文七妹十八岁过门时，毛顺生刚好十五岁，但已长得武高武大了。七妹过门以后，头两胎生的儿子都没有带大，1893年12月26日（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第三胎生下泽东，七妹生怕他“根基不稳”，便多方祈求神佛保佑。她吃“观音斋”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唐家坨外婆家的后山有个龙潭坨，坨内有一股清泉流出，四时不竭。坨口矗立一块大石头；高二丈八，宽二丈。石上建一小庙，经常有人来烧香祷告，称之为“石观音”。泽东生下来不久，外祖母要七妹抱着儿子拜“石观音”为干娘，并寄名为石头。因为他排行第三，大家便唤他为“石三”。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时，曾设宴招待乡亲父老。他在席间风趣地说，今天该请的都请到了，就差位长辈没有来。大家问是谁。他笑呵呵地说，就是我那“石干娘”呀！

泽东两岁时，七妹又怀了身孕，就把泽东送到外婆家抚养。从两岁到八岁这一段童年生活，他主要是在外婆家度过的。

泽东的外祖父文芝仪（1821—1888）有三男三女。长子文正兴（1853—1920）务农为业，排行第七，泽东称之为七舅。七舅母子女众多，被认为命中多福。泽东曾拜七舅母为“干妈”，意在托福。次子文正莹（1895—1929），排行第八，在家开馆授徒，泽东经常在那里旁听。

泽东的外祖家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全家大小几十口人，除自耕五十多亩田外，还租种人家五十亩。泽东每天同表兄弟们一起出去放牛、打猪草、拾野粪，日子过得很称心，乐不思家。每次韶山来人，他总是躲藏起来，生怕接他回去。

泽东在外祖母和母亲的熏陶下，也迷信神佛。1909年，因母亲生病许了愿，他曾经到南岳去“朝山进香”。他平日在家里敬祭天地祖宗，也是依时按节，从未间断。当1959年他重返韶山旧居时，还指着堂屋正中摆过神龕的地方风趣地说：“这是我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

毛顺生原来不信神，泽东同母亲都担心这样会为家里招灾惹祸，多次劝说，他都不听。后来有一次在路上劈面碰到一只老虎，他正害怕得发抖，老虎却掉头走了。他以为这是冥冥中有菩萨保佑，便转而信神了。但那时泽东知识渐开，反倒不信了。

毛顺生的家底虽薄，但他勤劳省俭，又善于经营，很快就由穷变富了。起初，他把自家省吃节余的稻谷加工成白米，肩挑到银田寺去赶集，并将一部分零售给附近的穷苦的樵夫和手工业者。同时，他还将碾碎的糠喂肥架子猪出售。不久，他积攒了一笔钱，赎回了毛翼臣典当出去的田产，自耕十五亩田，年收六十担谷。那时毛顺生夫妻，加上父亲和两个孩子，一家五口每年大约吃三十五担谷，还有二十五担左右剩余，在韶山冲是一户相当宽裕的中农。

后来，毛顺生得到岳家的贷款帮助，便到湘乡大平坳一带成批购进稻谷，扩大加工销售。人手不够，就雇请一个长工。到年底碾米时再加雇短工，运输的方式也由肩挑改为土车运送。进一步发展，他便从银田寺雇船装运白米，送往湘潭易俗河出售。他还贩卖耕牛，饲养生猪。这样，他手头积的钱多起来了，便于1903年买进堂弟毛菊生的七亩水田，使田产增加到二十二亩，每年收稻谷约八十担，上升为富农。

湘潭县清末隶属长沙府，是一个面积一万五千六百多平方里，人口近百万的大县。湘潭县城本来是湘、粤、赣三省水陆交通枢纽。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从西洋经广州进口的商品，运到湘潭，再转销内陆各地。内地的农产品如茶叶、蚕丝、药材等，也由此转运出口。当时，湘潭“陆路肩货的工

1905年，湘潭被辟为寄港地，英国太古公司、怡和公司造置一批浅水轮，专驶湘潭、长沙等地。西方资本主义的渗入，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也刺激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农民趋于破产，而极少数人则走上富农经济的道路。毛顺生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儿，他不再买进土地，但却典进了许多别人的地，并把积蓄下来的钱投资到商业上来。他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还和那里的祥顺和、彭厚锡堂等铺店有商务来往。他又用五百两银子押进桥头湾的田产，每年收入八十多担稻谷充作利息。自家印了一种叫“义顺堂”的纸票。还使用吉春堂的纸票流通周转。吉春堂是湘乡大平坳一家设有药材、肉食、南杂等几个门市部的大商店，它的老板是毛顺生的妻兄文玉端的岳家，姓赵。毛顺生为了与吉春堂结盟，还一手包办了三儿泽覃与赵家幼女先桂的婚约。这时候，毛顺生的生意做得很红火，已经是韶山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小财东了。

## （二）私塾发蒙

泽东从小聪颖，有不同寻常的理解力和记忆力。他寄居外祖家时，常在舅舅办的蒙馆里“旁听”，看样子虽是漫不经心，却能背诵蒙馆中点教的课文，还能脱手写字，深得舅舅的欢心。

1902年，泽东八岁，回韶山读私塾，启蒙老师邹春培，先教他读《三字经》，接着点读《论语》、《孟子》。邹春培也和当时许多三家村的塾师一样，要求学生背诵那些晦涩难懂的古书。背诵时，老师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学生背着老师站立，在那样紧张的气氛下，往往吓得忘记了已熟读的课文。轮到泽东第一次背书时，他不按规矩肃立，依然端坐在自己的课桌上。邹先生责问他为什么不站起来，他回答道：“你是坐着的，我也要坐着背。”邹先生将这番对话告诉毛顺生。顺生说：“他兴许是背不出来。”邹先生却说泽东记忆力极好，读几遍便能记住。毛顺生将信将疑，晚上课问孩子，果然背诵如流，自然心中暗喜。

泽东酷爱游泳，邹先生担心出事，有一次邹先生因事外出，嘱咐学生温书，不许离开私塾馆。当他回馆时却见泽东和几个学生正光着身子在池塘戏水。先生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处罚方法：让游泳的学生对对子，对不出，再打手心。他的出边是“濯足”，泽东稍加思索，随即对以“修身”。邹先生不禁点头称赏。

泽东对体罚很反感。某天，邹先生打了他，他十分气恼，背起书包离开塾馆，朝着想像中的县城方向出走。他在崎岖的山道上转了三天，当家里人找到他时，他才发现自己离家还不到八华里。回到家里，出乎意料之外，严厉的父亲并没有打骂他，邹先生也显得比往日温和。后来他回忆起这件往事，风趣他说这是第一次罢课胜利。

1904年秋，泽东转入关公桥私塾读书，塾师毛润生。1905年春，又就读于桥头湾私塾，塾师周少希。在这两处塾馆，他继续攻读四书、五经。虽然塾师不讲解经义，只是要求死记呆背，但他对书中的内容，还是能领悟不少。在塾馆读书时，他已经对书法感兴趣，初学欧阳询，后改学钱甫园；成年以后，兼采各家笔法，尤得力于怀素的狂草，终于笔走龙蛇，自成一派。

{ewc MVIMAGE, MVIMAGE, !09101200\_0033\_1.bmp}

钱沅（南园）的字

1906年秋，泽东就读井湾里私塾，老师是毛字居，读的是《春秋》《左传》。从此，他开始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与日俱增，到老都没有衰竭过。

1959年他返回韶山时，曾设宴招待毛宇居和一些老人，当他举杯敬酒时毛宇居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他紧接着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1906年，泽东因与父亲发生冲突，曾辍学两年多，在家务农。1909年，他在克服了父亲的阻挠以后，又先后到乌龟井和东茅塘私塾读书，为时一年。乌龟井的塾师毛岱钟毕业于政法学堂，以讼笔著称于韶山一带。东茅塘的塾师毛麓钟是韶山冲唯一的秀才，又曾在云南蔡锷部下供过职，见识较广。这一年中，泽东点读了《史记》、《纲鉴类纂》。泽东后来在《讲堂录》中写道：“（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历来人们都认为，司马迁将其游览四方所得山川浩瀚之气，一以发为文章，故气势奔放，雄视百世。泽东嗜读《史记》，司马迁的文章及行谊，都使他深为倾服。《纲鉴类纂》是明代王世贞依据朱高的《通鉴纲目》而编写的一种通史课本。这本书使泽东对中国历朝史事，有所了解。

总起来看，泽东在韶山六处私塾，先后上了六年学。他所读的主要是儒家的经典——四书和五经，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的经典，就是统治的思想，就是绝对的权威。泽东虽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少年，但也不能摆脱这种绝对权威的支配。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他还追忆道：“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他在私塾写的文章现在已无法找到，但他那时“很相信孔夫子”，是毋庸置疑的。就以他后来在第一师范时期留下来的几篇著作来看，仍是言必称孔孟，如发表于《新青年》的《体育之研究》，即征引四书、五经达八、九处之多。读《伦理学原理》（（德）泡尔生著，蔡元培译，商务印书馆1913年出版）时写的《批语》，所运用的哲学术语，如“良知”、“良能”、“尽心”、“知性”以及“浩然之气”等，大都出自《孟子》。1917年8月23日，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子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黎锦熙长期保留了毛泽东早年写给他的六封信，其中以1917年8月23日写的第三封最重要，以下简称《第三札》。大本而已。”这就表明，他那时仍在指望有孔孟式的圣人出来救世。1918年，他和蔡和森去北京为赴法勤工俭学进行活动时，本来就有机会广泛地接触新思潮。但据当时在蠡县布里村留法预备班任教的沈宜甲回忆说，蔡和森经常热情谈论十月革命，而毛泽东同他谈话的主题却是《周易》之“道”（见《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中《我所知道的早期之蔡和森》）。1920年4月，毛泽东为驱逐张敬尧事从北京往上海活动，虽然一贫如洗，还是不避艰辛，绕道去曲阜和邹县拜谒孔孟的故居和陵墓，他后来回忆说：“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一条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从这段追叙中，可以看出，青年毛泽东访问孔孟故乡时，对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 （三）新学萌蘖

少年毛泽东曾一度崇尚孔孟，却从来不是百分之百的虔信者。他早在私塾读“经”时，就萌发了许多“异端”思想。1906年在井湾里私塾读书，他已有相当的自学能力，爱读被塾师视为“闲书”、“杂书”的《三国演义》、

强的少年时代，书中的人物形象又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因而读过以后，印象极深，历久不忘。几十年后，他讲哲学、讲军事，引述书中故事，信手拈来，总是恰到好处。

在阅读《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的过程中，毛泽东开始思索一些重要问题。他后来回忆说：“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斯诺《西行漫记》）这段后表明，泽东不但好读书，而且善于独立思考，那么小的年纪，就朦胧地意识到社会上存在着一种统治与服从的关系。

1906年到1909年，毛泽东停学在家，白天参加田间劳动，晚上挑灯夜读。他的足迹虽然没有越出韶山冲，但他的思想却飞驰得很远，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经常为天下国家大事而劳思忧心。

在夜读中，泽东读到表兄文运昌帮他借来的两本新书，冯桂芬的《校庐抗议》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两本书，大大地开拓了他的视野。

《校庐抗议·制洋器议》中，有这样一段话：“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指者，则今日之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如耻之，莫如自强，夫所谓不如，实不如也。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勉强之无庸，……道在实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以求所以加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

冯桂芬通过中西对比分析，勇敢地提出了“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的改革方针。他的思想上承龚自珍，魏源等开明思想家的余绪，下开70—80年代早期改良派思想的先河。到20世纪初，这些主张虽然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但处在穷乡僻壤的毛泽东读到这本书时，仍然感到很有启发。中国何以不如“小夷”的问题，以及“虽蛮貊吾师之”的方针，对他来说，都还是初次听说。

当时毛泽东最喜读的还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郑观应是个熟悉中外贸易的官商，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派有过从属关系。他自称“涉足孔孟之道，究心欧美西学”。由于目击时艰，于1862年写成《救时揭要》，后增订改名《易言》刊行，至1893年再经增补修订，定名《盛世危言》出版，辗转翻刻达十余万部。在这部书中，郑观应议论时务得失，提出改良方案，基本上反映了甲午战争前早期改良派思想的概貌。《自序》说：

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育才于学校，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

郑观应把开议院、保商务、重技艺、兴学校作为“富强之本”，较之魏源等人的“师夷长技”的观点有了发展，同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提出的“船坚炮利”的主张也有所区别。他强调讲求“西法”，希望在君主立宪的体制下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但是，郑观应在理论上却力图从儒家学说中找根据，他引申《礼记·大学篇》的话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既曰物有本末，岂不以道为本，器为之末乎？”所谓“道”，指纲常名教，所谓“器”，指技艺器械。从这种观点出发，郑观应提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这表明，他在理论思想上同顽固派的“天不变道亦不

《盛世危言》所宣扬的改良主张，随着 1898 年的戊戌变法和 1900 年的自立军起义的失败，已宣告“此路不通”。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主张已成为思想主流。但是，对于僻处山村的毛泽东来说，君主立宪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他还觉得相当新鲜。他意识到中国决不能守着老样子不变。但如何变法，他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

1909 年，韶山的清溪李家屋场，从外地回来了一个维新派教师——李漱清，他常给人们讲述各地见闻，特别是有关维新运动的动人故事。他还劝说人们不要求神拜佛，主张废庙兴学。村里守旧的人指责他，甚至加以诽谤，而毛泽东却钦佩他有胆识，经常去找他谈心，向他求教，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介乎师友之间的亲密关系。

郑观应等人的著作，开阔了毛泽东的眼界，李漱清的谈话，更加扣动了他的心扉。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天下国家都处在大变化之中，自己不能守在韶山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应该抓紧学习新知识，准备投身到伟大的变革中去。恰好在这时，表兄文运昌告诉他，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讲授新学，在那里可学到不少韶山冲学不到的新东西。泽东听了很动心。八舅文玉钦、堂叔毛麓钟和表兄王季范等也都众口一词，说泽东若进了洋学堂，日后会有出息。毛顺生经过他们的劝说，认为这也许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事，便答应了。从此毛泽东飞出了山窝，走向了新的天地。

## 五 崇拜康梁

### （一）东山学堂

1910 年秋，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以后，十六岁的毛泽东离开韶山，来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谭嗣同在《浏阳兴算记》中提到：“湘乡改东山书院之举，又继之以起，趋向亦渐变矣。”这说明湘乡改东山书院为学堂是步“浏阳兴算”之后尘；成为戊戌以前最早兴办起来的新式学堂之一。

东山学堂在湘乡县对河的东台山下，学舍像一座城堡似地用砖墙围护起来，墙内还环绕着人工河，白石桥横跨河上，装点出一个幽雅静穆的读书环境。

毛泽东入学时，按常规命题作文，写了一篇《言志》。他出手不凡，校长李元甫十分欣赏他的才思敏捷，气象开阔，宣称“今天我们取了一个建国才。”稍后，他又写过《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国文教师阅后加批：“视似君身有仙骨，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东山学堂除了仍旧课读“经书”外，还设有当时称为“新学”的自然科学和史地课程，并有一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音乐和英语教师。这位教师经常向学生讲述日本明治维新转弱为强的史事，分析列强窥伺中国的严重形势。青年毛泽东听了，对时局深为关注。

东山学校的学生基本上是湘乡人。他们因来自上中下三里而形成地域界限，往往发生纠纷和斗殴。毛泽东是外来户，避开了这些纠葛，他正好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勤攻苦读上。

学校有一个藏书楼，毛泽东经常从那里借阅史地方面的书籍，增长了不少知识。国文教师贺岚岗看到他对历史有兴趣，特地买了一部《了凡纲鉴》送给他。有一次，他还从同学那里借来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书中记叙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英雄人物。毛泽东立即为书中人物所吸引，特别是读到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邻女皇、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时，他情不自禁地在书上浓圈密点，表示赞赏。还书时，对萧

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又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她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八年艰苦战争之后，才得到胜利，建立了美国。”（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26页）这席话表明，毛泽东少年时代就有了救国救民的宏伟抱负。而且联系他嗜读的书籍来看，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他倾向于崇拜武功卓著的英雄，诸如中国的秦始皇、汉武帝，欧洲的拿破仑、华盛顿、林肯等皆是，正如斯图尔特·施拉姆所论述的“尚武，无疑是毛泽东个人性格中一个根本特征。这个特征，我们在毛泽东一生每个转折关头都能看到。”（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中译本，第7页）毛泽东离开东山以前，曾经给自己取名子任。对这个别名，人们有两种解释：其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其二是他在读过梁任公（梁启超号）的《新民丛报》以后，决心沿着梁任公所指引的道路前进。

## （二）崇拜康梁

要实现救国救民的抱负，必须寻找思想上的导师。泽东当时首先找到的是康有为和梁启超。

康梁是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的倡导者。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等人一面主张倡西学、开议会；一面又认为这些都并非“道”、“本”，唯有“性命之原，天人之故”，才是千古不易之“道”。康有为了解这个“道器”“本末”之间的矛盾，他披着今文经学的外衣，通过宣扬孔子托古改制之说，来揭示自己的变法主张。在他看来，民权平等的资产阶级学说，皆合于孔孟的“圣人之道”，要挽救危局，必须抓住这个“道”和“本”。他还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谓当今为“据乱世”；经过变法维新，可进入“升平世”（小康）；而“太平世”（大同）则为未来之理想，可望而不可即。康有为的这套学说为维新运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武器和舆论准备。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时刻，康有为激于爱国热忱，联合各省应试举人，发动了有名的“公车上书”，反对《马关条约》，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一系列救亡图存的主张。1898年6月11日（阴历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下了一道“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由于阻力很大，写在纸上的诏书无法付诸实行，不出一百零三天，维新运动就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打击下归于失败。康有为逃亡海外，后来变成了“保皇党”的首脑。但是，维新运动的影响并未从此消歇。湖南是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基地，戊戌政变后，虽然同样遭到封建顽固派的摧残，但运动中的积极成果仍然直接影响了湖南的历史进程。例如戊戌前后开始兴办的卫矿企业，成为湖南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最早的萌芽；著名的时务学堂培育了第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湘学新报》（旬刊）、《湘报》（日刊）鼓吹维新变法思想，使社会上逐渐出现了“言新则群喜，语旧则众唾”的新局面；尤其是谭嗣同所主持的“南学会”、“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梁启超语），开启了议会政治之先声。所有这些，都猛烈地冲击着腐朽的封建传统，为树立新思想，新风气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毛泽东虽然晚出一代，未能躬逢戊戌维新的盛举，但仍为其流风余韵所浸润。

当1910年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表兄文运昌送给他一套《新民丛报》和一本记述康有力倡导变法的书。毛泽东立即为梁启超那种“笔锋常带情感”的文章所吸引，他把《新民丛报》读了又读，有的文章差不多能



革命民主主义成了我国 20 世纪初年的思想主流。湖南又是革命派的重要基地之一，英才辈出。但那时革命派的主要精力集中于联络会党，策划起义。而在思想启蒙方面，并没有多下功夫。梁启超则大不相同，他于戊戌变法失败亡命日本时，主编《新民丛报》，较广泛地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和政治思想。每出一册，内地争相翻刻，风靡一时。由于他曾经主讲时务学堂，在湖南的影响更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要不是从革命派那里，而是从维新派，特别是梁启超那里接受启蒙教育，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 （三）康梁的影响

康有为、梁启超对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而其中最突出的又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 一、主“变”哲学

康梁哲学思想中比较宝贵而有生气的部分，是关于变化日新的辩证观念。

康有为根据《周易》的“变易之义”，强调“易者，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他认为，事物总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天道，后起者胜于先起也；人道，后人逸于前人也。”同时，他还注意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因，初步提出了“物必有两”，“有对争而后能进”的辩证观念。这就尖锐地批判了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念。梁启超发挥了康有为的主“变”哲学，热情地歌颂创新，反对泥古守旧。他说：“俗论动曰，非古人之言不敢道，非古人之以法行不敢行，此奴隶根性之言也。夫古人自古人，我自我，我有官体，我有脑筋，不自用之，而以古人之官体为官体，以古人之脑筋为脑筋，是我不过一有机无灵之土木偶。”梁启超反对作古人之奴隶，提倡独立思考，对青年毛泽东有着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从五四前期留下的毛泽东早期著作来看，《体育之研究》提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伦理学原理批语》强调“抵抗”是发展的动力；《第三札》倡言“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所有这些，都同康梁主“变”哲学的影响有继承性的联系。

还应看到，康梁提倡“渐进”，反对“骤变”，强调“仁爱”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些对青年毛泽东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他在 1916 年 7 月 25 日写给萧子的信里，从改良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法国大革命和辛亥革命期间出现的暴力行动感到很不理解。直到 1919 年他主编《湘江评论》时，仍然留恋所谓“温和派”的调和思想，提倡“忠告运动”与“呼声革命”。这些都是与康梁的影响分不开的。

#### 二、大同世界的理想

康有为写了一本《大同书》，借用《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说，把社会进化过程划分为三大阶段，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同时，他又融合《礼记·礼运》中关于“小康”“大同”的说法，以“太平世”，附会“大同”，悬为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实际上，康有为是把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现实揉合在一起，用以“托古改制”，对儒家“大同”理想作了新的阐释。

怎样实现大同呢？康有为提出了去国界、去级界、去种界、去产界等主

旦消灭了家庭关系，“无有夫妇，父子之私”，私有财产也就自然消亡了。为此，他主张男女同居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婚姻乃“交好之约，不得有夫妇旧名。”在取消家庭以后，妇女怀孕入胎教院；婴儿出生入育婴院；幼儿入怀幼院；童子按年龄入蒙养院及大、中、小各级学校；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至老迈则进入养老院。为了解决人民生活的困难，还设有养病院、恤贫院、公共宿舍、公共食堂等。康有为的这种设计当然纯粹是一种幻想，但它对向往“大同理想”的青年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青年毛泽东在《第三札》中写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1919年，他在“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的影响下，进一步将这种“大同”理想化为具体的“新村”计划。在发表于《湖南教育月刊》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他提出要建立一种学校、家庭与社会结合为一体的“新村”。在这种“新村”里，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等，这比康有为《大同书》中的设计更为周详。至于家庭问题，他虽不像康有为那样把消灭家庭视为实现大同的主要关键，但也强调要解决家庭与社会的矛盾。他在1920年11月26日写给罗学瓚的信中，提出要组织“拒婚同盟”，通过废除婚约来解除“家庭之苦”，“使人类对于婚姻制度都得到解放。”这些，都是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观点的具体表现。追根溯源，不能忽视《大同书》对他的深远影响。

### 三、精神革命与“变化民质”的思想

1902—1903年，梁启超写了《新民说》。他认为近代中国的“积弱”，主要原因在于“国民”的“愚昧落后”、“道德败坏”和缺乏“国家思想”、“权利观念”、“自治能力”等等。他强调“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只有造就了新型的国民，才能革新政府、改造国家，达到变封建主义中国为资本主义中国的政治目的。在这里，梁启超认为清王朝之所以能维持其腐朽统治于不坠，是由于人民群众缺乏文化素养和政治思想觉悟，这比仅仅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又深入了一层。梁启超认为中国根本的出路在于改变“人心道德”，提高国民觉悟。这种重视思想启蒙的倾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梁启超把一切归结于“人心道德”，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精神领域的革命，这就难免在另一方面贬低了现实政治斗争的意义。梁启超的这一套理论，无论其积极方面或消极方面，都在毛泽东早期思想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直到五四前夕，毛泽东在《第三札》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仍然认为，中国积贫积弱，根本原因是“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二者不洁，遍地皆污”。因此，根本的解决还在于从改变“人心道德”、“变化民质”入手。这种观点与《新民说》基本一致。1918年，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创立学会，确定以“新民”为会名。在为新民学会起草会章时，毛泽东提出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也正是这种观点的具体化。

### 四、康梁笔法

康有为、梁启超都善属文。他们不屑于恪守古文“义法”，不满足于雕章琢句，而注重落笔自然，辞以达意。他们通过办报纸，设学会，著书立说，上书言事而干预政治，影响相当深远。特别是梁启超，他早期所宣传的虽大

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低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毛泽东当时就是被这种魔力所支配并起而仿效的一个。

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校长李元甫曾经当众表扬他的文章深得康梁笔意，号召大家向他学习。他的习作《言志》、《救亡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一时为全校师生所传诵。以后，他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和湖南全省高级中学（省立一中的前身）上学，都以作文优异著称。

1913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第四师范学习。国文教师袁仲谦（吉六）先生是前清举人，最重古文教学，很欣赏毛泽东的才气纵横，笔力雄健，但又嫌他的文章太像梁启超的“野狐笔”，劝他多读古文。为此，毛泽东曾经下功夫熟读《昭明文选》和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他还从玉泉山旧书店买回一套二十多册的《韩昌黎全集》，将袁老师批注过的善本借来校正其中讹错。经过反复研读，揣摩其笔法，他终于能写出一手入格的古文来。袁仲谦在评语中，甚至称赞他的文章“深得孔融笔意”。现在我们从他写的《祭母文》、《一切入一序》及一些书信中，还可略见当年文采。不过，这种古体并不适于反映变化日新的现实生活。因此，“五四”以后，他主编《湘江评论》时，便改用白话写作，终于崇实黜华，使文风与学风、形式与内容臻于统一。

总括以上几点，可以看出，康梁的思想启蒙，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发展，的确形成了一个不可缺少的过渡环节，它开辟了一条由初步接受启蒙教育而走向“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通道。

## 六 探求“宇宙之真理”

### （一）探讨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

1911年春，东山学校的贺岚岗老师应聘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任教，毛泽东也跟随贺老师前往读书。

毛泽东第一次坐轮船从湘潭到长沙，顺利地进入湘乡驻省中学。读到下学期时，革命党人就于10月10日发动了武昌起义。10月22日，毛泽东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亲眼看到了新军在长沙“反正”的情景。为了支援武汉，毛泽东毅然报名参军，在长沙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里当上了一名列兵。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帝宣布退位以后，毛泽东天真地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了，他决心脱下戎装，继续求学深造。他曾经报考过几个职业学校，后来正式进入“湖南全省高级中学”（后改名为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由于学校课程繁杂，校规刻板，不利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毛泽东在那里待了半年，又自请退学，寄住湘乡试馆，每天到定王台省立图书馆去自学。他在这里阅读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还广泛地涉猎了一些近世欧洲文史哲名著的中译本。这是他通过梁启超的论著而接触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之后，进一步比较系统地研读“西学”。

1913年春，毛泽东二十岁，以第一名考入湖南第四师范。1914年2月，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学习，至1918年夏毕业。在这五年半的时间里，国际上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国内发动了五四爱国救亡与思想启蒙运动。在革命高涨的新形势下，毛泽东的政治倾向越来越明显。后来他追忆当年的思想状况说：“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确定无疑的。”

在学术方面，他的兴趣集中在文史哲方面。他于四师写的课堂笔记《讲

他在杨昌济老师的指导下，与蔡和森、陈昌、萧子异、萧子、熊光楚等组成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对哲学和伦理学问题进行定期的讨论。在此期间，他精心研读了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写下了一万一千多字的《批语》。开始阅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并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以下简称为《研究》）一文。此外，他还经常与师友通信，探讨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提出他自己独到的见解。

## （二）归根于“大本大源”

青年毛泽东在《批语》中一则说：“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再则说：“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灭，吾人固不灭也，不仅死为未死，且生亦系未生，团聚而已矣。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

把这两条批语联系起来，可以明显地看出，青年毛泽东肯定人生是肉体与灵魂的团聚。这种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有思想渊源的。庄子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张载说：“气于人，生而不离，死而游散者谓魂。”他们都认为气是生命的本质，气聚则生，气散则死。青年毛泽东继承了“聚散”之说，但并不主张“气”一元论，而是认定精神与物质“共存”，带有二元论的色彩。

毛泽东在《批语》中还写道：“即宇宙亦终古在同状之中，并无创作之力。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即精神不生物质不生，既不灭何有生乎？”这就表明，他肯定世界上有物质与精神两种本原，后来他说自己早年曾经信奉过康德的心物二元论，就是指的这种观点。

二元论的特征是调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青年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倾向主要表现于自然观方面。在他看来，自然界独立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这种唯物主义倾向，在1917年所写的《研究》一文中有更充分的表述：“夫知识之事，认识世界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这就是说，我们的感觉活动有赖于感觉器官，思维活动有赖于人的大脑。无疑的，这些都是清醒的唯物主义的认识。

然而，由于毛泽东当时并不是一个自觉的唯物主义者，因此，即令在体育问题上，他也还不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在论及体育与智育、德育的关系时，他说：“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这种比拟在中国哲学史上早就出现过。王夫之说：“车者形也，所载者神也。”人们一向认为，这种论点具有唯物主义倾向，这是不容否定的。但是，如果加以过细推敲，就不难看出，从这种比拟中还可能引出唯心主义的结论。试想，如果人的身体只是负载精神活动的某种容器，那末，精神难道不可以离开这种容器而进行单独的活动吗？事实上，青年毛泽东正是抱有这种看法。1916年他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这就是说，人的肉体停止活动以后，灵魂可以继续独立的活动。青年毛泽东的这种观点，与康德的二元论哲学有关。20世纪初，康德哲学在我国风行一时。严复，梁启超、章炳麟、王国维、蔡元培等，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来接受和传播康德哲学。严复具有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在认识论方面，他接受培根的经验归纳法，对陆王“心学”进行过尖锐的批判。但他又以康德的先验哲学为

不可知的。梁启超宣扬康德的先验哲学，尤其不遗余力。他在《近世第一哲学家康德之学说》中认为，人的生命有两种：一是肉体生命，属于现象界，受必然法则支配；一是本质生命，即“真我”或灵魂，它超越于时间和空间之外，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在《新民说》中，他进一步将宋明理学与康德的先验论相比附，谓“阳明之良知，即康德之真我，其学说之基础全同。”毛泽东多次谈到他青年时代曾经信奉过康德哲学。由于当时还没有人原原本本地翻译介绍过康德的原著，他所看到的主要是一些新康德主义的杂拌（如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伦理学史》）以及梁启超等人提供的第二手第三手材料。

毛泽东在1917年研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所作的《批语》中写道：“宇宙间非仅有人生一世界，人生以外之世界必尚有各种焉。吾人于此人生之世界已种种经验之，正应脱离此世界而到别种世界去经验。”在这里，他也是把人生理解为五官肉体与心灵活动的复合。人死时，灵魂就会离开肉体“到别种世界去经验”。《批语》还写道：“人由生之界忽然而入死之界，其变化可谓绝巨，然苟其变化之后，尚可知其归宿之何似，则亦不至起甚大之畏惧。今乃死后之事毫不可知，宇宙茫茫，挽驾何所，此真足以动人生之悲痛者也。”他仍然深信灵魂是不死的，所憾者不知其归宿。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所指出的，这种灵魂不死的观点是一种最古老的唯心主义形式。在中国哲学史上，包括张载、王夫之等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都还不能完全摆脱这种传统观念。毛泽东正是接受了他们的影响，而又把这种观念纳入二元论的轨道。

毛泽东《研究》一文的思想主流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但一旦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和触及哲学的根本问题，其唯心主义倾向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主要是由于在 worldview 方面，长期以来，老师们所口授心传和他自己所耳濡目染的，主要还是孔、孟、程、朱、陆、王以及新康德派、新黑格尔派的哲学思想。它们在青年毛泽东的头脑中产生着错综复杂的影响。

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讲《伦理学大要及本国道德之特色》，采用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作教本。但是，他“所讲不限西洋之伦理学说，中国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王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页）在中西两个渊源中，仍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而宋明理学尤为杨昌济所推崇。

毛泽东是杨昌济最得意的门生，自然会受到杨的熏陶。他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与蔡和森、张昆弟等经常讨论宋明理学，研读过《近思录》、《朱子语类》、《小学》等书，对朱熹和王守仁十分佩服。在与黎锦熙、萧子通信时，他多次征引朱熹语录。当他游览朱熹讲学遗址时，还情不自禁地发出过“千载德犹馨”的赞语。（见罗章龙：《亢斋汗话》，刊长沙《湘江文艺》1980年2期）

朱熹提出世界的本原是“太极”之理。他认为抓住了这个“理”，就是抓住了“大本”。“大本不立，小规不正，刮落枝叶，栽培根本。”杨昌济服膺朱熹哲学，也强调要抓住“大本”，不过，他不把这个“大本”称为“太极”，而称之为“大原则”：“宇宙为一全体，有贯通其间之大原则，宇宙间所有一切之现象，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原也。”

### （三）相信“理具于心”

及生死问题时，提出了“精神不灭、物质不灭”的命题，认为精神和物质，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这就是说，精神与物质共处于统一体中，两者有一个“共存”的基础。

然而，物质与精神“共存”的基础，世界的终极本源究竟是什么呢？青年毛泽东说：“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这就宣告了精神是世界的本体或本源。《第三札》写道：“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正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或朱熹的“理”一样，“宇宙之真理”是某种既不依赖于自然界，也不依赖于任何人的独立的精神本原，它是全部现实世界的灵魂，自然、社会以及思维领域的各种现象都只不过是这种“宇宙之真理”的表现而已。由此可见，青年毛泽东虽然从梁启超和泡尔生等人那里接受了康德的某些影响，并自认为是心物二元论者，但他断言精神性的“宇宙之真理”是世界的本原，这却是按照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对哲学基本问题所作的回答。

在时间与空间的问题上，青年毛泽东也接受了康德的影响。梁启超介绍康德的时空观说：“空间时间二者，皆吾智慧中所假定，非物本有故”，“道德之性质，不生不灭。而非被限被缚于空劫之间者也。无过去无未来，而常现在者也。”（梁启超：《近世第一大哲学家康德之学说》）泡尔生祖述康德的观点说：“当如康德之说，时间者非现实存在之形式，而吾人感官直觉之形式也。”（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27 年版，第 192 页）在《批语》中，毛泽东承袭他们表述的这种观点，而又融合谭嗣同的时空观，加以发挥：“余意以为生死问题乃时间问题，成毁问题乃空间问题，世界上有成毁无生死，有空间无时间。”他从根本上否认时间的客观性，混淆生死的界限，并进而引申出“既无现在，亦无过去，又无未来，身体精神两俱不灭”的奇特结论。

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都把“理”作为宇宙的本原。所不同的是客观唯心主义主张“理”在心外，而主观唯心主义主张心就是“理”。当青年毛泽东认定“本源”是“宇宙之真理”时，他的立脚点是客观唯心主义；而当他进入认识论领域（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时，却说“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作为认识对象的“宇宙之真理”被移置到心中来了，客观唯心主义便由此而转化为主观唯心主义。

在《批语》中，这种变化也有反映：“人类者与本体有直接关系，而为其一部分；人类之意识亦即与本体之意识相贯通，本体或名之曰神。”所谓“本体之意识”，即“宇宙之真理”；“人类之意识”，即具于人心的“宇宙之真理”。前者是“大本大源”，后者是它的“发显”或表现形式。由于两者是互相贯通的，所以他又说：“我即实在，实在即我，我有意识者也，即实在有意识者也。”他把心外的“理”（实在、本体、神）和心中的“理”融为一体了。“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从我与实在（本体、神、理）相贯通的观点出发，他进一步断定人和物都不能离开我而存在，即客观不能离开主观而存在。这当然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

{ewc MVIMAGE,MVIMAGE, !09101200\_0059\_1.bmp}

在本质与现象问题上，毛泽东的这种唯心主义观点也有很明显的表述。《批语》写道：“事实本无区别，而概念有区别，以为便利言语记忆计也。”“凡宇宙一切之差别，皆不过其发显之方面不同，与吾人观察及适应之方面有异而已，其本质只一个。”既然客观事物本质相同，为什么会表现为现象上的千差万别？“形状也如阴阳、上下、大小、高卑、彼此、人己、好恶、

别相构成之，”所谓“差别相”，即表象的意思。康德认为“物自体”是客观存在的，但它是一种无定型、无秩序、无规律、无特征的抽象存在。《批语》所谓“其本质只有一个”，也就是这样一种抽象存在。“物自体”的抽象存在永远不能为人们所认识，但它能对人心起到某种激发作用。人们在物自体的激发下，运用先天所固有的主观直觉形式、知性范畴等，进行分析与综合，在头脑中构成表象，即《批语》所谓差别相。在另一段《批语》中，毛泽东说：“差别之所以生，生于有界限。”界限的实质是什么呢？按照康德的说法，“物自体”作为认识的对象，有本质与现象两个方面：本质属于超经验的彼岸世界，是不可认识的；现象世界属于此岸，是可以认识的。《批语》的另一段说：“为界域生活之人类其思想有限，其能力有限，其活动有限。”一连三个“有限”，都类似于康德所规定的认识界限。

这种唯心主义观点还鲜明地表现在知行关系上。《批语》写道：“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既建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当时他从唯心主义先验论出发，基本上赞同“知先行后”，同中国哲学史上朱高的观点十分接近。他强调一个人要确立信仰和志向时，首先要研究哲学和伦理学，求得“真知”。为此，他决心以全副精力“向大本大源探讨”。以为“探讨既得”，就可“权此以对付百纷”，解决一切矛盾。舍此莫由，则势必陷于盲目。他认为，如果没有“真知”，没有探得宇宙之“大本大源”，即令自己确定了某种求真求美之志向，也不过是“盲从之志”，而非“真志”；发为某种行为，诸如“守节、育婴、修桥补路，乃至孝、友、睦、雍、任、恤种种之德”也“无非盲目的动作”。

青年毛泽东还接受陆、王影响，特别强调主体实践（道德行为）的能动性。《讲堂录》记下了“激厉奋迅，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的象山语录。《批语》极口称颂“主观之道德律”和“精神之个人主义”。《第三札》突出地强调主观立志，都是把主体实践的能动性作为向封建传统挑战的精神武器。

#### （四）“实学”思潮的影响

在认识论方面，青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上面提及的许多材料说明，他当时的确接受了理学唯心主义向内追求的认识路线；另一方面，我们在他的读书笔记和早期著作中，又可以发现许多唯物主义的的认识论见解。例如《批语》指出：“有无价值，人为之事也，是否真理，天然之事也。学者固当于天然本质中求真理，其有无价值抑其次也。”“种种著述皆不过钩画其实际之情状，叙述其自然之条理。”完全符合于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原理。《批语》接着又说：“吾人之心灵限于观念，观念限于现象，现象限于实体。”对实体可以作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不同解释。联系《批语》前后文来看，似乎还是把实体看成某种“终在同状之中”的精神本原。这对青年毛泽东来说，当时还是一个难以克服的矛盾。

在认识的来源问题上，青年毛泽东倾向于经验论。“其知也，亦系经验而知之。”这就是肯定直接经验是人们获得知识的根本途径。肯定直接经验也并不等于排除间接经验的意义，如语言文字记载了许多间接经验：“此种语言在其起源确已合于客观界之事实，乃由种种之经验而来者也。由一人而论，从幼少之时，即兼而习之，似为构成于先天者。从历史观之，则纯成乎经验，而非所谓先天直觉也。”在这里，毛泽东对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关系作出了比较正确的阐述。

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继承了我国明清的“实学”传统。严复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培根等英国经验派哲学家所提倡的逻辑归纳、实验印证的科学方法，强调从经验中获得第一手材料，并对唯心主义的“心学”“理学”和八股制艺展开了尖锐的批判。毛泽东在湖南图书馆自学时，通过阅读严复的译著，对此已有初步了解。但对他影响更为深远的则是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的“实学”。早在湖南第四师范时，他在《讲堂录》中就摘抄了潘耒为《日知录》所作的序言，对顾炎武从事地考察，“足迹半天下”，“留心当世之故”，“究源探本，讨论其所以然”的治学态度，衷心钦服。1917年，他撰写《体育之研究》，又标举顾炎武、颜习斋、李恕谷作为文武兼备、三育并重的师表加以称颂。习斋最重视直接经验，反对空谈心性，主张到实际中去锻炼。习斋的这种观点，对毛泽东后来的思想发展有重要影响。特别可贵的是，毛泽东不止于坐而论道，还能身体力行。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曾多次与蔡和森、萧子、陈绍休、易礼容等深入各地农村了解民间疾苦，以后还在岳麓山作过建立新村，实行半工半读的尝试，在他的身上，隐然可以看到“经世致用”和“习行哲学”的影子。五四运动以后，他的这种倾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得到进一步发展，终于形成了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知行统一）的认识路线和思想作风。

## 七 圣贤创世观

### （一）“心力说”

中国人一向有重史的传统。这一点，在毛泽东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早在韶山上私塾，他小小的年纪就读过《左传》、《史记》和《通鉴类纂》。1912年在长沙上全省高等中学，他读的第一本书就是从老师那里借来的《御批通鉴辑览》。进入第一师范以后，他认真研读了《读史方輿纪要》《资治通鉴》等古籍，还广泛阅读了梁启超等近人的史学著作。同时，他又精心研读并批注过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该书写道：“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管辖也。彼其完成本质发展生活之动作之模型，既已发现，则自能利其故见，动其新思，而终实现于动作。”毛泽东欣然同意泡尔生的这种观点，他特意在眉批上加以肯定：“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这就是把历史当成观念的实现，把观念当成主宰历史的“大本大源”。在鲜明地表述历史观的《第三札》中，毛泽东又把这个精神性的“大本大源”命名为“宇宙真理”，并写道：“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所谓“宇宙之真理”是一种独立的精神实体，它不依赖于人而独立存在，而人类历史反倒是“宇宙真理”的发显或实现。

《第三札》又写道：“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这样一来，人心和宇宙真理相贯通，那么，探求宇宙真理和发挥“心力”的作用也就自然统一起来了。通过赋予宇宙真理以二重性，毛泽东得以把他历史观的重点转向于发挥“心力”的能动作用。

毛泽东最尊敬的老师杨昌济极力推崇谭嗣同的“心力”说。《仁学》写道：“人力或做不到，心当无有做不到。”“夫心力最大者，无不可为。”“若能了得心之本原，当下即可做出万万年后之神奇。”“缘劫既由心造，亦可以心解之也。”谭嗣同力图从“精探性天之太原”入手，唤起虚夸性的主观精神力量，用它来冲决网罗，挽解劫运。

杨昌济早年曾在南学会面聆谭嗣同的教诲，后又精研《仁学》一书，更衷心折服。《达化斋日记》写道：“余研究学理十有余年，殊难极其广大；



须冲决利禄之罗网，次须冲决伦常之罗网，终须冲决佛教之罗网。心力迈进，一向无前；我心随之，猝增力千百倍。”杨昌济就这样以神秘的形式极度夸大“心力”的作用。他还经常在课堂上发挥这种观点，这对生徒们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张昆弟日记》中就记下了1917年9月16日同游昭山寺时，毛泽东曾对他与蔡和森、彭则厚等道及“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张昆弟也表示“余甚然其言，且人心能力说，余久信仰，故余有以谭嗣同《仁学》可炼心力之说，友鼎丞亦然之。”由此可见，“心力说”确为杨门弟子所共同信奉。毛泽东还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对此说作了系统的发挥。杨昌济极为赞赏，给评了一百分。将近20年后，毛泽东在陕北与斯诺谈话时，追忆及此，还津津乐道。这篇体现了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得意之作，现已无处寻觅，但夸大主观精神在历史上的作用，在他当年的书札和《批语》中，几乎随处可见。

## （二）圣贤独得“大本”

“天下之生民备为宇宙之一体”，但其品位有不同层次。青年毛泽东在《第三札》中，按孟子所说的“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将人划分为“君子”“小人”两类。君子“养其大体”，是劳心者和统治者。小人“养其小体”，是劳力者和被统治者。小人从事各项具体的职业，终日经营忙碌，他们“不得大本”，缺乏“高尚之智德”，所以在精神方面又归属于“愚人”一类。

对“养其大体”而又居于社会上层的“君子”，毛泽东在《讲堂录》中遵从师训，将他们又划分为“传教之人”和“办事之人”两类。“传教之人”的最高典范是孔孟、程朱、陆王，他们致力于究明真理，宏扬教化，泽被千秋万代，故被尊为圣人。《研究》写道：“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正是这种观点的典型表述。

至于“办事之人”，尊奉圣贤之所垂教，也能建功立业于当世，但他们无心穷究“宇宙之真理”，也达不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境界。“王船山（谓）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豪杰也，而非圣贤。”这就是说，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掌握宇宙真理的圣贤。“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帝王将相与英雄豪杰（“办事之人”）即令功业彪炳，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仍不能与圣贤相提并论。

在《第三札》中，毛泽东对这种圣贤创造历史的观点作了更为系统的发挥：“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为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虞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在近代的历史人物中，毛泽东认为真正探得“大本大源”的只有“曾文正”。“文正”是清王朝加给曾国藩的谥号，此人一向崇奉孔、孟、程、朱之学，以“转移风气而陶铸一世之人”自命，他在学术上虽然没有很多建树，但却善于将程朱义理与现实斗争相结合，使之成为护卫纲常名教、镇压太平军的精神武器。因此，他历来被士大夫们视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完人”。杨昌济也反复研读过曾国藩的著作，手抄其《求阙斋日记》。1915年4月5日，杨昌济与毛泽东谈心以后，还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这个高材生的殷切期望：“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的生平和著作，写过不少批语和笔记。如《讲堂录》中，就有一些曾氏语录。还记下了曾氏《圣哲画相记》中的三十二圣哲，和曾氏所倡导的立身行事的“八本”，奉之为信条。在1915年9月6日给萧子 的信中，更极口称赞曾国藩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尽抢四部精要”，“孕群籍而抱万有”。读此书以通经史子集，可“察其曲以知其全”，“知其微以会其通”，“守其中而得其大”“施于内而遍于外”，故奉之为国学津梁。正是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当他把曾国藩对比袁世凯、康有为、孙中山等近代历史人物进行衡量时，便断言，独有曾国藩抓住了“大本大源”。

### （三）改造哲学与普及哲学

通过近代历史人物的对比分析，毛泽东还得出了一个结论：救国救民乃至超凡入圣之道，都须着力抓“大本大源”。而抓“大本大源”又有两层意义：第一研究哲学，探求“宇宙之真理”，掌握贯通天道与人性的“大本一原之道”。第二义是普及哲学，即“倡学”。毛泽东谓“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这是就第二义说的。又谓“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他强调要“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即通过研究和普及哲学来“动天下之心”，把这看作是救国救民的根本之图。

但是，毛泽东又认为各人心中所具之真理“有偏全之不同”：“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在这里，他把是否探得“大本大源”看作是上智下愚的分界线。上智者，“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间，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在他看来，超凡入圣的奥秘，全在于掌握“大本大源”。

我们知道，康有一向以救世主自居，把群众看成“朴而愚”“蠢而野”“学问不进，智识不开”、“心思不发越，志意不绰胜”，难免当“亡国”之民。（康有为：《公民自治篇》）梁启超更把中国人民称为“四百兆（四亿）群盲”，把革命群众运动视为“一呼而蜂蚁集，一哄而鸟兽散，不顾大局，徒以累国。”（梁启超：《新民说·论毅力》）在康梁的思想影响下，毛泽东那时也曾把人民群众称之为“愚人”。他认为一般愚人“不得大本”，他们的眼光狭隘，行动有盲目性，“缺乏高尚之智德”。“终日在彼等心中作战斗者有数事焉，生死一也，义利一也，毁誉又一也。”这类愚人“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他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往往像“商货”、“土木”一般地被人“颠倒”和“播弄”。这种遭遇实在可悲可悯，从他们身上看不到创造历史的积极力量。

青年毛泽东恳切地期待圣贤出世，担当起拯救“小人”的重任。但圣贤对待人生也有两种态度，巢父和许由离群索居，独善其身，是“出世”的态度，毛泽东坚持“入世”的态度。他说：“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陷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他觉得圣贤不应该独善其身，而应该以慈悲为怀，尽力把广大群众从苦难的深渊中解救出来。

怎样解救群众的苦难呢？康梁等人的原则是主张改良，反对革命。康有为激烈地攻击法国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强调中国须以此作为殷鉴，否则一旦发生革命，就将使“中国之亡益速”；梁启超也认为法国革命是“暴民政治”，是“洪水猛兽”，中国决不能走法国式的革命道路。欲救中国必

跳出康梁的窠臼。他在1916年7月25日写给萧子 的信中，忧心忡忡地说：“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前车不远，即在辛亥。”这表现了他对暴力革命深怀疑惧。在1917年9月22日他和张昆弟谈话时说：“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这段话表明他所赞成的是运用“批判的武器”来除旧布新，而所疑虑的是运用“武器的批判”来进行暴力革命。归根到底，还是离不开康梁所提倡的“新民”、“变化民质”的路子。不过，这时候他又认为康梁只是抓住了一些枝叶，没有抓住根本。根本的办法是从抓“大本大源”入手。他说：“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比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噎皆闻，则沛乎不可御矣。”认为一旦哲学得到改造和普及，“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彼。”这样就超脱尘俗而达到“世界大同”、“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了。

#### （四）“世界大同”与“天人合一”

大同思想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礼记》早就揭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降及近代，康有为著《大同书》，倡言“近者自由之义，实为太平之基”若“全世界人类尽为平等，则太平之效渐著矣。”这就使“大同世界”具有了资产阶级理想王国的性质，同时也杂糅了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毛泽东早在少年时代就是康有为的崇拜者，辛亥革命以后，康氏“从枝节入手”的变法维新主张虽早已退色，但大同世界的理想却仍然具有相当魅力。所以，1917年毛泽东在《第三札》中，仍然念念不忘“大同者，吾人之鹄也”。该札对在封建专制统治下陷于水深火热的“小人”“愚人”充满深切的同情，对未来的“太平大同”的美好理想表现出衷心的向往。

天人合一论是一种以“有机整体”为基调的宇宙观，也是我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特色之一。庄子曾经幻想过绝对自由的“逍遥游”。他放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把自己寄托于超出形骸之外的精神活动，其实质是要通过取消主观能动性，使人完全顺从自然的命运。孟子也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与天地同流。”同庄子的倾向性恰恰相反，他是夸大主观能动性，通过培养和发挥唯心主义的“浩然之气”来达到“与天地同流”的境界。青年毛泽东的理想王国也融入了“天人合一”的色调。他所憧憬的“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是把天与人看成一个息息相通的有机整体，其间了无判隔。不过，为了实现这种理想，他既不像庄子那样消极地顺应自然，也不像孟子那样潜心于养气，而更重视其理性的作用。他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是“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因此，企望有圣贤出世，通过改造哲学来改造现实世界和达到“世界大同”“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张昆弟1917年9月22日的日记中，记述了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交谈的一段话，具体地揭示了通过改造哲学来改造现实世界的思想：“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托尔斯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曾经在写给中国人民的一封信中指出，20世纪初期的中国和俄国以及东方国家的形势有相同之处，“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都已面临这样一个时期，即他们已不可能更长

正是这种不安现状、决志变革的精神，至于国人，他和张昆弟都对谭嗣同与陈独秀表示钦佩。这两个人，一个是戊戌维新“冲决网罗”的先驱；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树此两人作为典范，可以明显地看出，毛泽东等人所衷心向慕的，正是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思想最解放、斗争最勇敢的先进人物。他所坚持的破旧开新的方向是正确的，只是过高地估计了圣贤（“大气量人”）的作用，过低地估计了群众的作用。

事实上，青年毛泽东的历史观本身也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他尊崇圣贤而低估群众，把群众称为“不得大本”的“愚人”；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人心中都有部分真理，只要开智蓄德，可以“共跻于圣域”。正是在这种圣贤可以转化的认识上，他发出了“倡学”和“普及哲学”的号召。他说：“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心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他认为通过普及哲学，愚人可以转化为圣人。五四运动以后，他开始确立“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的观点，但仍十分重视倡学的作用。“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数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他认为“学者”通过“倡学”把哲学交给了群众，群众就会成为社会变革的积极力量。这就显示了毛泽东历史观转变的重要契机。

## 八 危机与选择

20 世纪初叶，中华民族面临着双重危机：几千年的封建礼制秩序因西方近代文化的冲击濒临全面崩解，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暴露了重重矛盾。旧传统是“剪不断，理还乱”地纠缠不清，新潮流又夹带着污泥浊水奔涌而至。中国的出路何在？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在劳思伤神，上下求索。

任何历史转折，必然通过危机与选择来实现。困难与机遇并陈，选择便是人们对历史发挥主体创造性的表现方式。

### （一）五四前后的变化

1918 年 7 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他便与蔡和森等发起成立了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同年 8 月，毛泽东为了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蔡元培校长安排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虽然每月只拿得八元薪金，但所得的精神粮食却极为丰富。

北京这座拥有八百年历史的古城，当时既是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1917 年，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力倡“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思想空前活跃。李大钊、陈独秀揭开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序幕，李石曾、吴稚晖以无政府主义相标榜，胡适积极宣扬实用主义哲学，辜鸿铭、刘师培等擎起保存国粹的旗帜，……一时出现了“百家竟起，异说争鸣”的生动局面。

毛泽东当时对各家学说尚无定见。为了探寻真理，除了可以向图书馆长李大钊随时请益以外，他曾走访过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陈独秀和胡适，与学生的活动分子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等都有过深浅不同的接触。为了交流思想和探讨问题，他参加了北大的哲学学会、道德学会、新闻学研究会以及“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还阅读过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并同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学生朱谦之有接触，同他讨论过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的可能性。

{ewc MVIMAGE,MVIMAGE, !09101200\_0078\_1.bmp}

1919 年 3 月，毛泽东到上海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以后，返回湖南。旅居北京半年，使他大大地开扩了眼界，增强了政治积极性。正如他后来同斯诺谈话时所说的：“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愈来愈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学生首先发动的伟大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了。消息传来，毛泽东在湖南立即发动新民学会会员和进步学生起来响应。“六三”以后，他又策动湖南各界组成了四百多个“救国十人团”，为爱国运动的持续发展打下了较广泛的基础。

五四运动不仅是伟大的爱国运动，而且也是空前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随着运动纵深发展，各地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出版刊物，传播革命思想。1919 年 7 月，湖南学生会创办了《湘江评论》，由毛泽东任主编。这个刊物虽然只出了五期就被张敬尧封闭，但毛泽东却采用不同形式，先后在

长篇小说《民众的大联合》。

同毛泽东在五四前期的著作比较起来,《湘江评论》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它以满腔热情赞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我(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德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他还以十分兴奋的心情描绘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在这里,他似已把五四运动看成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新的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次,五四以前,毛泽东究心于思辨哲学,强调“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甚至把农工商以及一切物质生产都视为多余,向往于“呼大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的虚幻境界。那时候他力求从精神方面来探讨宇宙之“大本大源”,用以解释一切。《湘江评论》一反五四前期的唯心观点,强调从实际出发,强调物质生活的重要性。该刊《创刊宣言》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这表明他已高度重视物质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接着,他又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指出,学术界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1919年11月14日,发生了轰动长沙的赵五贞女士因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内用剃刀自杀的社会悲剧。毛泽东立即抓住这一典型事件,在湖南《大公报》上接连写了十篇文章,从包办婚姻到剥削制度,层层深入地挖掘造成悲剧的社会根源,揭示恋爱、婚姻问题对经济基础的依赖关系。

报刊工作与现实斗争有着紧密的联系。五四以后,通过主编《湘江评论》、《新湖南》和在《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大量富有战斗性的论文,对他转向于深入研究社会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问题,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动因。

再则,五四以前,毛泽东推崇圣贤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五四以后,在《湘江评论》所发表的言论,特别是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他转而寄希望于人民群众了。

毛泽东肯定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人民大联合的胜利。他认为贵族、资本家有武力、资财、“知识”三种手段,但他们究竟人数太少。广大人民如果联合起来,这三种手段,也可以转化为人民所有。“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鸞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毛泽东还运用这一原理回过头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他说:“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在这里,他对会党、新军和留学生的评价虽带有片面性,但指出辛亥革命由于没有真正发动群众的大多数而归于失败,却是比较深刻的认识。

1917年8月,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曾经强调改造国家和社会,首先要抓“大本大源”,而要探得“大本大源”又必须仰赖于洞察一切的“圣人”。但是,经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他终于认识到唯有“民众的大联合”,才是改造国家社会的根本方法。他从人民群众中探得了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大本大源”,这是根本观点的变化。由于根本观点有了变化,所以他对革命前途也就充满了信心:“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五四前后,毛泽东在思想领域虽然发生了以上三点重要变化,但还远远没有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他在报刊上发表的言论来看,他当时基

《创刊宣言》中，毛泽东提出：“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文学、政治、社会、教育。经济、思想、国际等方面的强权，“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他说：“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谬误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这些话表明他当时还是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说话，还把社会上的剥削和压迫现象看成一种思想的迷误与不幸，并希望通过“忠告运动”和“呼声革命”，劝说“强权者”“回心向善”。十分明显，他当时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

在1918到1919年这两年中，毛泽东开始接触了一些社会主义思潮，但他的政治立场基本上仍然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他说：“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所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和中国的习惯，非死人不加议论，著述不引入今人的言论，恰成一反比例。我们当以一己的心思，居中活动。如日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不管他到底是不是（以今所是的是），合人意不合人意，只顾求心所安合乎真理才罢。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来的。”

## （二）选择“俄式革命”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充满着矛盾和论争的。但五四前期，资产阶级的新学同封建主义旧学的对立是文化论争的焦点。到五四后期，焦点就转移到“俄式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同各式资产阶级思潮及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论争上来了。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本来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五四过后，陈、李的政治参与意识加强了，陈独秀甚至因散发政治传单而被捕。胡适接手主编《每周评论》，便依据其实验主义哲学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李大钊立即著文加以批驳，强调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离，只有在主义指导之下，才能寻求问题的根本解决。自此以后，新文化阵营便开始出现裂痕。

毛泽东在创刊《湘江评论》时，还崇奉实验主义为指导思想，随后接受胡文的影响，草拟《问题研究会章程》，准备对各种问题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发表，勾起了他思想上的矛盾，并表露出寻求解决根本问题的倾向。但中国的问题错综复杂，遵循何种途径才能求得根本解决呢？这却使他陷入困惑：他曾经对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怀抱浓厚兴趣，并在岳麓书院半学斋作过新村生活的试验，但试验并未成功；他同朱谦之一起讨论过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的可能性，但虚无飘渺的幻梦终归走向破灭；他还曾积极策划和参预湖南的“驱张（敬尧）运动”与“自治运动”，但这种改良主义的构想又被谭延、赵恒惕等地方军阀打得粉碎。

在新民学会和湖南革命青年中，当时“毛蔡”齐名，同被奉为革命青年的表率。1918年6月，蔡和森为勤工俭学事，最先到达北京，他那时就衷心向往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在蠡县布里村留法预备班时，他自称“崇奉共产主义，承认苏俄为世界牺牲。”（沈宜甲：《我所知道的早期蔡和森》，见人民出版社编《回忆蔡和森》第138页）1920年2月到达法国的蒙达尼以后，他每天以顽强的毅力，凭借字典的帮助，阅读法文报刊，广泛接触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与实践中的各种问题。1920年7月6日至10日，赴

为学会活动的根本方针，但对进行改造的途径，在认识上出现了分歧。“激烈派”以蔡和森为代表，主张马克思主义，采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和世界，“温和派”以萧子异为代表，口头上标榜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实质上是推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会后，蔡和森同萧子异都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了争论意见。萧子异认为：为了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斯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此较和而缓，虽缓然和。”

蔡和森的信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作了积极的阐发；对无政府主义作了尖锐的批判。他说：“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二：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公有。换言之，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因此，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新民学会资料》）

毛泽东在接到这两种观点根本对立的信件以后，联系实际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于1920年11月至1921年1月期间，先后给蔡和森、萧子异和在法新民学会会员，写了两封回信，明确表示“深切赞同”“俄国式的方法”，不同意“温和革命”。他并且把萧子异的“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与罗素到长沙讲学所宣扬的“教育万能论”的观点联系起来，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曾与英国工人代表团去苏联访问。他自称主张共产主义，而反对“劳农专政”。他认为“以武力为革命的方法”，是“俄国共产党最大的错误”。（《布尔什维克主义》，《新潮》第3卷第2号）罗素到长沙讲学时，极力反对中国走俄国革命道路，宣扬中国的出路是发展实业，兴办教育，推行“基尔特社会主义”。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一些会员曾前去听讲。对罗素的观点，会员中有人赞同，有人反对，他们“展开了极详之讨论”。

萧子异在蒙达尼会议上所发表的意见同罗素的观点基本一致。一年前，毛泽东在《湘江评论》所发表的言论同罗素的观点也比较接近。但是，在短短的一年中，他的观点有了很大改变。由于这一时期，他认真学习了马恩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刻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等三本著作。从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受到教益，从蒙达尼会议的辩论和挚友蔡和森的来信中得到启发，加上自治运动失败的教训，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使他的思想有了质的飞跃。所以，他在给蔡和森等人的回信中说：“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异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主要是因为资产阶级所以掌握教育权，是同他们有议会、政府、法律、军队和警察等国家机构，占有银行、工厂企业和各种文化教育机关，控制着一切权力分不开。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他又肯定：“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这就是说，他已经认定：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革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削阶级“回心向善”的阶级调和论。他在信中指出，从历史发展来看，“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剥削阶级的本性，决定着他们对金钱、享乐的无止境的欲望。因此，对资本家进行“忠告运动”，要资本家放弃剥削，只是荒唐的梦想。他还独到地指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这就是说，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实行暴力革命才能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在这里，他完全抛弃了一年前所热衷的“呼声革命”、“无血革命”，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结论。

在毛泽东发出两封回信的同时，新民学会于1921年元旦，在长沙召开新年大会，同蒙达尼会议一样，就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毛泽东在会上进一步明确地表示他赞成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对其他各种社会思潮一一进行批判：“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的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话虽说得不多，但言必有中，语不虚发，立场观点非常鲜明。

蒙达尼会议和长沙会议关于新民学会方针的讨论，实质上是一场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辩论，它是当时国内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问题论战，和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论战在新民学会内部的深刻反映。通过这两次会议和通过讨论，毛泽东在理论上大大提高了一步。

五四运动以前，毛泽东在历史领域基本上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五四运动以后，《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明确了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这是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突破。现在，通过论战，毛泽东又确立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初步掌握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个问题是列宁主义的核心。一旦这个问题获得解决，他的整个立场观点便顺利地转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来，得出了“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的结论。不论这时候他对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多么粗浅，这毕竟是毛泽东从一个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唯心主义者转变为唯物主义者的根本标志。

### （三）开创中国式的革命道路

1921年7月，毛泽东到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随即返回长沙开展党的活动。8月，他以船山学社为基地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在所拟《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提出：“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由湖南船山学社创设，定名‘湖南自修大学’。”这一段话表明，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毛泽东仍然十分重视包括古代书院制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斯图尔特·施拉姆所著《毛泽东》一书中为此着意指出了：“‘自修大学’虽然极其强调新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但也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传统，其中特别包括像王夫之这样的持批判态度的唯物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家。中国共产党许多未来的干部，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毛泽东在参加那里举行的各种讨论会的过程中，继续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奠定基础，而‘马克

免有些夸大，但却抓住了值得注意的苗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在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在第三国际成立的初期，列宁所制定的东方政策比较正确，因而，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革命的兴起，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斯大林掌权以后，由于“苏联利益中心”作怪，片面强调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忽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作用。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鲍罗廷、罗易等执行斯大林的右倾策略，与陈独秀的右倾领导联结在一起，将军政大权拱手让给国民党，招致大革命的惨重失败。

大革命失败以后，“八七”会议试图纠正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毛泽东在发言中追索原因，说：“从前我们骂孙中山未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只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他并且明确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取得的。”这是第一次提出枪杆子出政权的观点，成为他后来发动工农武装起义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先导。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共中央委托，领导湖南地区的秋收起义。起义队伍初战失利。毛泽东在浏阳文家市召开会议，决定改变进攻长沙城的计划，率部进驻井冈山地区。早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就流露过要“学梁山泊好汉”的意向。这时候，他真的仿效中国古代绿林豪杰上山扎寨的方式，开创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了加强军队建设，毛泽东于1928年3月，手订《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为八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无疑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但也不能忽视它的文化渊源。曾国藩当年组建湘军时，创制《爱民歌》，也提了六项注意。因全文长达五百七十字，这里单把第一条抄录于后：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鸡和鸭，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毛泽东同曾国藩创建的军队性质截然相反，但他们都手订了六项注意。其第一项注意都落在门板上：一个叫“上门板”，一个叫“莫取门板”，若合符节，耐人寻味。

毛泽东首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红军处于白军的四面包围之中。他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正确地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口诀，同《孙子兵法·谋攻篇》所说的“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的精神实质完全一致。毛泽东在指挥作战前，还要求选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力求通过不断取得战役的胜利，最后达到战略上的转弱为强，这更是《孙子兵法·虚实篇》“十攻其一”策略思想的出色运用和重要发展。

毛泽东对古代兵法和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曾经遭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强烈反对。1932年临时中央到达革命根据地以后，不但逐步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而且在《革命与战争》等刊物上陆续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他进行“清算”。他们指责毛泽东军事路线“便把古时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他们强调：“这些

——蒋介石专有。”

毛泽东同教条主义的倾向作了长期的韧性的斗争。早在 1930 年，他就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当时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在斯大林的指导下，通过了《政治决议案》等 18 个文件。这些文件对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有一些内容相当严重地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由于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一切听命于斯大林，因而党内会后更滋长了一种依赖国际、依赖《决议》的“本本主义”思想。针对这种思想，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有的党员认为“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

1931 年 1 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借助马列主义的外衣，依仗共产国际作后盾，严酷地统治着党中央，使革命事业遭受惨重损失。

1935 年 1 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基本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扭转了极端危险的局势，胜利地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打开了革命的新局面。抗日战争展开以后，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他号召全党开展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竞赛，紧接着又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仍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并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同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遗产结合分不开的。后面我们将从“结合”的角度，就他在这一时期思想上和理论上的主要贡献作一些探讨。

## 九 “两论”与中国传统

### （一）“两论”的由来

毛泽东在 1920 年初步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他自认为颇得益于读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阶级斗争》（考茨基）、《社会主义史》（刻卡朴）三本书。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上山打游击，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所能读到的只有 1932 年打漳州获得的几本书，即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等。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经常以在莫斯科拜师读经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而鄙薄从硝烟烈火中磨练出来的毛泽东思想为“狭隘经验论”。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特别是 1937 年 1 月进驻延安以后，局势相对稳定。毛泽东于是“发愤读书”，而尤究心于哲学。当时译成中文的马列原著以及三十年代苏联红色教授和中国左翼哲学工作者编写的教本、讲话，他都找来研读，在学习过程中还认真作了笔记。近来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辑录了毛泽东对十本书的批注和一篇读

的，又占了其中六本，可见他在三十年代末期这一段攻读哲学著作之勤奋。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有这样的描绘：“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来几本哲学新书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什么都不管了。”当时从外边带进革命根据地的哲学新书数量有限，而渴望读到它的人却很多，因而不得不采取传阅的办法。据石仲泉考证，从毛泽东读的《辩证唯物论教程》上就发现“有几种不同的批划和批注的笔迹。”（石仲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导论》第2—21页）毛泽东之所以为读哲学新书而暂时中断与斯诺的谈话，很可能就是要抓紧在限期以内读完这几本书，再传给其他人。

1936年8月在保安时，毛泽东就已读过《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珂夫等著，李达、雷仲坚合译，笔耕堂出版）第三版，1937年1月进驻延安凤凰山以后又重读，许多章节批读了三遍，有的可能是四遍。前后批注多达一万两千余字。

读《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米汀著，沈志远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时间稍晚一些，批注的重点主要是有关认识论与辩证规律的几节，全文约两千六百多字。可以看出，读这本书时，他是更直接地为撰写“两论”作准备。

“两论”的初稿原是毛泽东1937年《辩证法唯物论提纲》中最重要的两节。毛泽东根据《提纲》，曾于1937年7—8月间向抗大前身的红大一二期学员系统他讲授哲学课。（据原抗大二期学员郭子清的回忆。引自郭子清致温济泽的信）胡耀邦在《最好的怀念》一文中也说：“一九三七年，我在抗大学习，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哲学讲课就是我在的那个班讲授的。”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毛泽东于日理万机之际，仍坚持讲课。现在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油印讲义未注明“论矛盾统一律完。一九三七，八·七。”时间恰恰在“七七”事变爆发一个月以后。8月上旬国共两党谈判红军改编问题，8月下旬中共中央又在洛川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哲学课至此被迫中断。因此，辩证法的其他规律都未能讲完和整理成文。

毛泽东在撰写和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提纲》时，自谦地说：“我这个讲义也是不好的，因为我自己还在开始研究辩证法，还没有可能写出一本好书，也许将来有此可能，我也有这个志愿，但要看研究的情况才能决定。”（见《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他自己虽然不很满意，但群众中的反映却很热烈。和培元是当年崭露头角的青年哲学家，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抗大的哲学讲座，迄今犹胎炙人口，他的讲授提纲——特别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述之所以那么爽朗、生动、有力，这不仅是由于他的文字流畅易读，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活的中国革命经验，这就指示着新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见《中国文化》第2卷第2—3期合刊，1946年8月20日出版）和培元的评论可谓识得此中三昧。

毛泽东读《教程》之类的有字之书，虽然在数量上赶不上在书斋里“饱学”的留学生与专家学者，但有一点过人之处，就是他曾经长期参加和领导革命的实际斗争，特别是在“围剿”与反“围剿”的奋斗中，原已读过那本客观辩证法的“无字之书”，现在批读从苏联传来的“有字之书，一经勘破，往往能“由此及彼”，豁然贯通。发而为讲演和文章，便具有厚积薄发、深入浅出的特色，为专家学者所不及。

以上情况表明，毛泽东写作提纲和“两论”之所以取得成功，既得力于

联三十年代哲学著作的“有字之书”。但除此之外，更有不容忽视的第三层，那就是从更深远的文化背景来看，“两论”还是对中国哲学与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下文将就此作一些具体的历史考察。

## （二）知行观

在中国哲学史上，自先秦的孔墨开始，许多思想家都提出过自己的知行学说。特别是宋明理学，对这一问题曾经反复辩难。朱熹主“知先行后”说；王阳明主“知行合一”说；王船山批判朱熹“先知以废行”、王阳明“离行以为知”，而提倡“行先知后”，“知行相资”说；颜习斋继承船山哲学，更强调“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的习行哲学。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研读过一些宋明理学家的著作，对朱熹和王阳明尤为钦服。他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一方面强调“行动”和“奋斗”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人类之有革命，有进步，有改过之精神，则全力新知识之指导而活动者也。”这就与朱熹“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观点相当接近。1917年8月他在给黎锦熙的《第三札》中，强调离开真知的“立志”和“行动”必将陷入盲目，也与朱熹说的“无知的行是冥行”有相通之处。

同时，陆象山、王阳明强调主体实践（道德行为）的能动性，对他也有相当影响。《讲堂录》记下了“激励奋进，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的象山语录，《批语》极口称颂“主观之道德律”和“精神之个人主义”。《第三札》突出地强调主观立志，都是把主体实践的能动性作为向封建传统挑战的精神武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认为知行本是一回事。“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其哲学体系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他提出行是知的尺度却蕴含着合理的因素，对青年毛泽东确立“重在行事”的观点和发挥主体实践的能动性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近代，孙中山从革命需要出发来探讨知行问题，并把自己阐述知行学说的著作称为“孙文学说”，这对于唤起青年毛泽东注意研究知行关系问题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孙中山说：“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便发生力量。”青年毛泽东说：“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既建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

五四运动以后，青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开始从思辨的领域转而面向实际。他积极参加了湖南的“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并强调说：“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他所领导的新民学会一开始就把“真心求学，实意做事”作为选择会员的标准，在后来的发展中，更进一步把“改造中国与世界”悬为奋斗的目标。事实表明，他那时在理论和运动、知和行的关系问题上，已逐渐把重点转移到“行”或“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上来。

1920—1921年，青年毛泽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积极参加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在以后的长期斗争中，他一贯强调从实际出发，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反对认识与实践相脱离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倾向。1937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为了揭露、批判教条主义的理论基础，他确定以认识论为讲课的重点。备课时，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研读了《船山遗书》。由于手头的《遗书》不全，他还写信给当时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请设法从湖南补齐所缺诸册。1950年，《实践论》公开发表，他又特为加上一个附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明人类认识在实践基础上有规律的发展过程，最后作了一个小结：“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与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这一段结束语总括全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系统地解决了他多年来所悉心探求的传统哲学问题——知行关系问题。

从字面上看，《实践论》并没有征引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著作和言论，但字里行间却明显地看得出它批判和继承古代知行学说的痕迹。如墨子肯定认识的来源是“闻知”（间接经验）与“亲知”（直接经验），并特别重视“亲知”。《实践论》也讲知识“不外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两部分”，并运用墨子的哲学范畴，强调“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但在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视“亲知”的莫过于清初的颜习斋。他强调，只有“著取而纳之口”，才能识别蔬菜的味道；只有通过“诊脉、制药、针灸、摩砭”的实践，才能“疗疾救世”。《实践论》所说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同颜习斋的话不但命意相同，而且措词也相仿佛。与程朱提倡“读书明理”，向内追求的认识路线相反，颜习斋反对死读书，强调“读书乃学中之一事”而已，不必全副精力用于读书，《读书无他道，只要在行字着力”。毛泽东关于“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的论断，同习斋哲学如出一辙。而且，颜习斋还强调“读书愈多愈惑，愈无知，办经济愈无力”。“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他把对死读书的批判发展到极端，乃至全盘否定了读书的意义。毛泽东晚年关于哲学问题和知识分子问题的谈话中，也出现过类似的偏颇见解。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实践论》一方面继承了从墨子到颜习斋重视“亲知”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对“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批判。“不出户，知天下”，语出《老子》。儒家把这句话接了过来并给加上秀才的名衔，所强调的无非是“致知不假外求”。西学东渐以后，严复最早运用他从西方学来的经验归纳法对此进行批判。到毛泽东写《实践论》时，又进一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并概括了同“知识里手”（教条主义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所以他的批判更加鞭辟入里，深中肯綮。

关于《实践论》同传统哲学的继承关系问题，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1950年，李达写了一本《实践论解说》，对我国古代的知行学说作了旁征博引。后经毛泽东审阅全文，未作任何修改。同时，冯友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实践论）——马列主义的发展与中国传统哲学问题的解决》，它回顾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知行观，反复论证《实践论》“正是发扬了自古以来的、认识论上的、唯物论的传统，解决了中国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如知行先后，知行分合，知行轻重等问题）毛泽东曾经慨叹理论界研读《实践论》所发表的文章水平不高，唯独对冯文表示赞赏，决不是偶然的。

到1964年，毛泽东《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又对这一问题作了一番历史的回顾，并说：“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中国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些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贽）、王船山（夫之）、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那就是说，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即知行关系问题，直到《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才讲清楚。毛泽东研究哲学，特别注重认识论。五四运动以后，他很少讲宇宙观，

行关系问题。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他甚至说：“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这句话是即兴而发，并未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但如将论题缩小，单单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心问题是认识论，那便是确凿无疑的了。

### （三）矛盾观

《矛盾论》是《实践论》的姊妹篇。它比之《实践论》带有更鲜明的中国特色。英国著名学者 T·李约瑟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发源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它与现代科学联系起来，而又最后转向了它的发源地。这一见解颇能发人深思。中国古代的《易经》、《道德经》等书。本来就包涵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曾熟读过这些经典，《讲堂录》（1914年）并从中取过不少材料。1917年所写的《（伦理学原理）批语》，提出“差别”普遍存在，“抵抗”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强调发挥内因的作用和自我奋斗精神，更显示出辩证法思想闪光。而当他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时候，就更为自觉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固有的辩证法思想。

《矛盾论》开篇就指出：“形而上学，亦称玄学。”“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辩证法的宇宙观，在中国古代就产生了。的确，我国古代哲学著作早就提出了矛盾的概念和矛盾同一性问题。《易传》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些古老的哲学命题初步揭示了发展的根源在于对立面的相互作用。《道德经》说得更清楚“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说明矛盾双方是对立的统一，一方以另一方为存在条件。后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评说诸子学说时指出：“其言虽殊，避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皆相成也。”班固所表述的也是这个意思。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便直接采用了“相反相成”这一命题来说明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他说：“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这是对传统哲学命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释。

《矛盾论》还继承和发挥了我国古代辩证法的矛盾转化思想。老子曾经多次从正反两面的矛盾双方来说明事物的相互依赖关系，并指出任何事物矛盾双方的地位总是向着它的对立面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毛泽东不但在《矛盾论》里系统地阐述了这一矛盾转化的原理，而且，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还直接征引老子关于祸福转化这一名句来说明坏事和好事可以互相转化的道理。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还引述了司马迁的一番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针对当时党内大批干部调职下放的情况，毛泽东运用司马迁所揭举的一系列生动事例来启发他们对矛盾转化的认识，起到了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促进作用。

所谓矛盾转化，就是事物发生质变阶段的矛盾运动。由于事物矛盾的性质各各不同，质变阶段的矛盾运动往往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其中包括有矛盾双方地位转化这种形式，也还有矛盾双方互相融合以及重新组合种种其他形式。

如，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与精神之间的这种关系，以前列宁强调它具有“绝对”的意义。但《矛盾论》却提出两者的地位可以互相转化，精神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而起主要的决定作用。这种观点同我国古代辩证法家将矛盾双方地位转化加以普遍化的倾向有某种继承性的联系。

我国古代辩证法的另一个问题是将转化纳入同一性的范畴。本来，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结（正题），是经过矛盾的转化（反题）而达到对立的统一，即同一（合题）的。转化是否定，同一是否定之否定。这是辩证法的一条基本规律。但我国古代哲学家却几乎一直把转化与同一混为一谈。事物的质变，意味着矛盾主次双方的易位，通过两次向对立方面转化，矛盾双方各归原位。因此，“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一治一乱，周而复始，被当成了必然规律。其结果，也就取消了否定之否定，只剩下肯定与否定的循环，看不到发展是螺旋式的上升运动。

在这个问题上，《矛盾论》也接受了我国古代否定观念的影响，把转化纳入了同一性的范畴。毛泽东 1964 年《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进一步断言矛盾规律是辩证法的唯一规律，而否定之否定规律则被肯定否定的对立范畴所取代，它也正同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诸范畴一样，被当作是矛盾规律的一种表现形式。

总之，《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典范式的哲学著作。他在写作这“两论”之前，认真研读了一些苏联三十年代的哲学著作，这是它的直接理论来源。但是，他在进行构思和写作时，又结合中国实际，批判地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形成自己的独特范式与风格，这也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一个方面。

## 十 “实事求是”

我们经常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一精髓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值得认真研究。

从思想渊源来看，“实事求是”既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出的理论概括，也是他对湖湘以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

### （一）湖湘求实学风

毛泽东是农家出身。农民长年累月地在田里劳作，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事事都要脚踏实地，不违农时、循序渐进，不能好高骛远，脱离实际。因此，长期在农业基础上形成的儒家文化具有实践理性的特色，强调“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学风。毛泽东在私塾课读中就已受到这种学风的浸染。进入湖南四师和一师以后，通过杨昌济的指引，更广泛地接受了以王船山为代表的湖湘求实学风的熏陶。1914 年 6 月，刘人熙等发起成立“船山学社”。青年毛泽东曾多次偕同蔡和森、萧子异等前往聆听学术报告。船山治学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为宗旨，力图“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他肯定宇宙是由“气”构成的物质实体，认为物质实体“气”和客观规律“理”两者不可分离。并以“纲组化生”说明“气”变化日新的辩证性质。在认识论方面，批判了程朱陆王的“知先行后”“知行合一”和佛教“消所入能”的论点，强调知是行的基础，“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体用一依其实，不背其故，而名实各相称矣。”他突出的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其流风余韵，陶冶三湘士子，对毛泽东尤有深刻影响。



生当清之初世，讲求习行哲学，学理明白浅近，皆为毛泽东所崇仰。1917年，毛泽东撰写《体育之研究》一文，标举顾炎武、颜习斋（即颜元）、李刚主（即李）为文武兼备、三育并重的师表，备加称颂，恰恰表露了他自己所选择的努力方向。

在湖南四师所记的《讲堂录》，还抄录了潘来为《日知录》所写的一段《序言》。

昆山顾宁人先生，生长世族，少负绝异之资，潜心古学，九经诸史，略能背诵。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钞节，经世要务，一一讲求。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探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这段《序言》，把顾炎武从事实地考察，讲求实学的精神阐发得非常清楚。《讲堂录》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字尚已。”“游之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对老师的这些教诲，他不但笔之于书，而且还能见之于行动。

在一师求学时期，他多次利用寒暑假，先后偕同好友萧子异、蔡和森、陈绍休、易礼容等到各地进行“游学”活动。他们“身无半文”，只是带着雨伞、包袱和笔墨，每到一地，就给一些学校、商店、仕绅或农民书写对联，接受一点馈赠，作为食宿费。一路上，他们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人士，了解民间疾苦、风俗人情、历史地理情况。回到长沙，毛泽东还把“游学”的感受写成通讯，发表在湖南《通俗日报》上，让更多的人了解下情。毛泽东与蔡和森都把这种“游学”活动称为读“无字之书”。“有字之书”是间接经验，“无字之书”是直接经验，他们喜欢把两者结合起来。

待到五四时期，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特别重视学风问题。他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痛切地指出“湖南讲求新学二十余年，尚没有崭新的学风。”他还从积极方面强调要“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经世”学风的继承和发扬。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推动下，青年毛泽东与我国许多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一道，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他在转变过程中卓然独立的特色，就是在向西方寻找真理时，总念念不忘要结合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1920年3月，他写给周世钊的信说：“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他提倡实地调查，讲求“穷源探本”地研究国情，以与顾炎武相较，堪称青出于蓝。

1918年和1919年毛泽东两度去北京和上海活动，对这两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进行了多方面的实地考察。1919年9月，他又在长沙发起“问题研究会”，并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提出了一百五十多个问题，其中有“中央地方集权分权问题、两院制一院制问题、大总统权限问题、民族自决问题、经济自由问题、社会主义能否实施问题、教育问题、女子问题、劳动问题……等等。当时胡适与李达有“问题与主义”之争，毛泽东发起“问题研究会”，开始显然受到胡适的一定影响，但胡适坚持一点一滴的改良，而毛泽东则既重视具体问题的调查研究，又亟盼寻求解决根本问题的途径。所以，他们两人后来分道扬镳了。

20年代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后，毛泽东所衷心关注的头等大事就是调查研究阶级斗争的现实状况。他后来回忆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在这里，毛泽东一开始就把眼睛瞄向实际，着手作实际的调查研究，这就同那些满足于照抄照搬洋教条的书呆子判然不同。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以后，毛泽东以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负责人的身份与李立三徒步到安源，深入煤矿矿井和工人宿舍作调查，并制订了开展工人运动的方针和步骤。

1925年春节前夕，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在家乡韶山住了五、六个月，一边养病，一边在农村进行调查，提高了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他开始懂得，在农民占多数的中国，只靠城市的工人而不把农民发动起来，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在大革命的高潮中，毛泽东于1927年1—2月间，深入湖南农村，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农民运动情况。三十三天行程一千四百里，广泛地接触了农民、干部和各阶层的人，召开了各种类型的调查会，掌握了大量丰富的感性材料。根据调查的情况，毛泽东先后两次在中共湖南省委作报告，并于2月中旬，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将农民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十年内战时期，毛泽东首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7年末，他做过永新、宁冈两县的调查，后来报告丢失了，毛泽东痛心他说：“失掉别的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常常念及，永远也不会忘记。”1930年初所作的《寻邬调查》、《兴国调查》，是现存最完整详细的调查报告。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十年内战时期，毛泽东以其独特的方式，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情作了最切实的调查研究，为解决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通过掌握大量丰富的调查材料，毛泽东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者“唯上”“唯书”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他于是响亮地发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号召。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当时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在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指导下，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关于民族问题决议案》等18个文件。中共党内从此产生了一种依赖《决议》的“本本主义”思想。针对这种思想，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有的党员认为“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

这些言论虽然切中时弊，但在当时却还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真理。1931—1934年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进而更严酷地统治着中共中央。他们不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用外来的模式剪裁中国革命的实践，将“国际指示”当作尚方宝剑，用

的失败。中国共产党人终于从失败中吸取了惨痛的教训，通过遵义会议改变了党的领导机构，并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表明了正确思想路线在中共中央更牢固地确立起来。

### （三）批判继承与创造性转化

在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下，1938年9月底至11月上旬召开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主题报告中，以最后一节透彻地阐述了“学习”问题。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为此，他提出了相应的三方面的研究任务：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遗产、研究当前的实际运动。

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呢？毛泽东认为，不应当把理论当作教条，而应当把它看作行动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它的词句，而应当把它作为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应当只是了解它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是应当从中学习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

如何研究当前的运动呢？毛泽东强调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它的特点和规律性，它的全面及其发展。并说：“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样就把他一贯提倡的调查研究提升到了掌握规律性和坚持党性原则的高度了。稍后，毛泽东又出版了《农村调查》一书，并在整顿三风的一系列报告中，对调查研究为什么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了系统完整的阐述。他说：“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他还着重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如何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呢？毛泽东有一段著名的论述（见本书第十一<四>页）他还突出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其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这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最后，他还满怀感慨地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提倡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也是一般号召与典型示范相结合的。他在1941年重新阐释和大力提倡“实事求是”，推动延安整风，使人们真正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确在党内外开创一代新风。

“实事求是”这一命题原本是儒家实用理性思维方式的经典表述。从历史上考查，班固的《汉书》为河间献王刘德作传，称颂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人颜师古把它注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清初顾炎武以经世致用之实学，反宋明理学言心性之空谈。其后乾嘉汉学训释经义，更强调“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曾国藩为调和汉宋二家之争论，又说：“近世乾嘉汉学，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乎？他重新解释了实事求是的意义，强调汉学的实事求是与宋学的即物穷理是互相贯通的。其要旨在于恢复原始儒学的实用理性

服曾文正”（见毛泽东 1917 年 8 月 23 日给黎锦熙的信）其所特为赞服的正是曾氏所标举的“实事求是”精神。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著名报告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他的讲话继承了“事即物”“是即理”的传统观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实事求是”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使这一命题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变化，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风与思想路线。

在对“实事求是”作过马克思主义的崭新论证以后，1942 年，毛泽东为中央党校作了“实事求是”的题词，1945 年又为党的“七大”纪念册作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题词。由于毛泽东的科学阐释与大力倡导，经过延安整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终于在全党范围内得到确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如果说，清代诸儒的“经世致用”之学，是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的一种反动。那末，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则是在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经世致用”的实学传统，是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一种反动。

在学术思想史上，有些原来在旧体系中显得很平常的命题，在经过新思想家的切磋琢磨与改造制作以后，可以焕发出耀目的光彩。“实事求是”这个古老命题，一经妙手点化，就对整个毛泽东思想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把一条龙给点活了。这是批判继承的优秀典范。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说法，就是在认同和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创造性的转化。

## 十一 兵家韬略

毛泽东独具特色的军事辩证法理论，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在总结长期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他对前代兵家韬略作了认真的钻研、继承与转化。

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学生时代，直到“长缨在手缚苍龙”的战争岁月，他从自发到自觉地钻研与继承前代兵家韬略，大体上有四条渠道：其一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以战争为题材的通俗小说；其二是反映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经验的《曾国藩家书》、《曾胡治兵语录》；其三是《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史鉴；其四是中国兵家宝典《孙子兵法》。这里所要着重探讨的问题是，他如何将前代兵家韬略与自己的革命战争经验冶为一炉，并创造性地转化为戛戛独造的军事辩证法理论。这一理论体大思精，兹仅就其继承关系着眼，举要作四点说明：

### （一）灵活的作战形式

同许多前代农民战争一样，毛泽东以游击战起家，但他更善于根据战争实力的变化，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三种作战形式，灵活地加以运用。

首创井冈山根据地时，幼小的红军处于白军的四面包围之中。1928 年，毛泽东就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提出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口诀当然是从实际斗争中摸索出来的，但也的确融汇了前代农民战争的艰苦经验。

井冈山上以前有个朱老聋子（朱孔阳），长期占山为王。其对付官军的口诀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和朱德都了解并介绍过朱老聋

先领他兜个圈子，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就要抓得准，抓得狠，要打得干净利落，要有缴获。”（韩伟《毛委员教导我们用兵作战》）

曾国藩在《家书》中描述过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况：“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又进，顽钝诡诈，揉来揉去，若生手遇之，或有破绽可伺，则彼乘隙而入，”《家书》还谈到捻军作战的特点：“此贼故智，有时疾驰狂奔，日行百余里，连数日不少停歇；有时盘于百余里之内，如蚁旋磨，忽左忽右，贼中相传秘诀曰：‘多打几个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所谓“贼中相传秘诀”云云，实即太平军与捻军的谋略。毛泽东早年就研读过曾氏《家书》，十分留意湘军与太平军、捻军的作战经验。待到他亲自带兵打仗时，这些经验自然都成了他制定战略战术的参照系。

毛泽东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总结打游击战的经验，除了“十六字诀”以外，还提到：“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所谓打圈子政策，正是前代农民战争的传统。

1930年，红军根据地由井冈山转移到赣南、闽西，队伍和领土都扩大了。从变化了的情况出发，红军在作战形式上，转而以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之战是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里程碑。据郭化若回忆，毛泽东曾说这次战役采用了太平军“五瓣莲花抄尾阵”的打法。其兵力部署是：“前面一支先扎定”；左右两支兵钳住敌人；另外一支兵迂回敌后，这就叫抄尾。还有一支预备队，准备随时接应。（见郭化若：《远谋自有深韬略》）这次运动战迅速全歼包围圈内的敌人，活捉敌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战果十分辉煌。以后的第二次至第四次反“围剿”，都采用了这种运动战的作战形式。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认为抗日的持久战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上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上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后来八年抗战的实践证明他的论断不愧为科学的预见。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战争实力已大大增强。因此，毛泽东提倡大规模的运动战，结合开展阵地战，逐步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但是，各个阶段与各个战场上的情况不完全相同，这就决定着战略和战术的殊性。如1947年3月我军撤出延安前后，东北和华北我军正以大规模运动战的方式，开始战略性的反攻。但西北战场却继续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和带游击性的“蘑菇”战术。毛泽东在《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中写道：“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方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人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这里所讲的“蘑菇”战术，同太平军的“揉来揉去”、捻军的“如蚁旋磨”、朱老葺子的“只要会打圈”的打法很相似。

孙子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奇者，指多变的作战形式。正者，指阵地战的正规作战形式。毛泽东吸取了“奇正相生”的策略思想，并在革命战争的条件下，使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三种作战形式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其指挥艺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 （二）积极防御战略

历来兵家或主攻，或主防。毛泽东在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下，一贯强调要正确处理攻防关系，并创造性地提出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成为其军事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核心。

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进攻是消灭敌人的手段，防御则是为了保存自己。自来兵家所采取的战略虽各有不同的特点，但究其基本类型，不外进攻性战略与防御性战略两种。普鲁士参谋总长毛奇及其继任者施利芬提出的闪击战理论，是进攻性战略的典型，而《孙子兵法》则颇称述防御性战略，其言曰：“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近代湘军主帅曾国藩与胡林翼则把防御和进攻比譬为主客关系。蔡锷在《曾胡治兵语录》中解释道：“曾胡之论兵，极主主客之说，谓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他们都对防御性战略予以积极评价。

毛泽东重视古代兵法。对曾国藩的《家书》及其《治兵语录》，更是烂熟于胸。不过，毛泽东之所以采取防御性战略，主要还是从中国革命战争的需要与可能出发。正如他后来所概括的：“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的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的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的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规定了战争的持久。”以上特点，正是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但从主观上认清这些特点并形成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则有一个过程。井冈山时期，红军队伍弱小，武器装备简陋，不断遭到“进剿”“会剿”。在此种处境下，红军时刻要考虑如何防御敌人的进攻，但也不能放过任何可能进攻敌人的机会。“十六字诀”应时提出，表明游击战的战术日臻成熟，同时，还须着眼其发展，“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这就表明，它实质上已为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奠定了基础。

为了打破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与朱德于1929年初率部进军赣南、闽西。1930年扩编为红一方面军，具备了在较长的战线上和较大的战区内打运动战的条件，蒋介石视红军为心腹之患，决心向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毛泽东分析当时的形势，创造性地提出了“撒开两手，诱敌深入”的方针，将我主力撤退到赣江以东，敌主力诱至永丰县的龙冈峡谷，然后集中兵力，迅速合围歼敌，夺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ewc MVIMAGE, MVIMAGE, !09101200\_00122\_1.bmp}

由“十六字诀”到“诱敌深入”方针的提出，从作战方式看，是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推移。从战略高度来看，则标志着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基本形成。此后，蒋介石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毛泽东都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破敌。特别是第三次，一开始几乎全部放弃了中央根据地，但却在运动中创造了大量歼敌的机会，终于以“后发制人”而获胜。为了贯彻“诱敌深入”的方针，毛泽东多次用“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成语（此语源出《老子》、《韩非子》、《孙子》诸书）来说明暂时丧失土地与大量歼灭敌人的关系。无奈“左”倾教条主义者置若罔闻。当他们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时，坚持“不丧失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却招致了人地两失的惨重失败。

红军经过极度艰苦的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为了阐明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广泛征引我国古代的战例。他首先讲述了《水浒传》中“林冲棒打洪教头”的故事，生动地阐明退却与进

略高度加以概括道，“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他剖析“曹刿论战”的内容，揭示了三条经验：即：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论析层层深入，突出了积极防御的意义。接着，他又联类而及历史上的许多战例“中国战史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由此可见，他倡导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的确是厚积而薄发，建立在深刻地钻研中国古代战史战例的基础之上。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讲演《论持久战》，再一次回顾了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又加上晋楚城濮之战、韩信破赵之战两例。并着重指出：这些战役“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反复咀嚼，再三致意，益见其对古代战例的钻研与其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 （三）“弱生于强”“以众击寡”

毛泽东继承孙子“弱生于强”和“以众击寡”的辩证观点，强调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提倡在战役和战斗中“以众击寡”，即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孙子说：“弱生于强”“强弱，形也。”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但要在战略全局上，将敌强我弱变为敌弱我强，非一朝一夕所能为功；而在局部上，即在战役或战斗中造成敌强我弱的态势，则是通过正确的指挥，可望争取办到的。因此，为了创造转弱力强的有利形势，孙子还提出：“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这就是说，在战役和战斗中，要注意防止我之兵力分散，造成敌之兵力分散。力争集中五倍乃至十倍于敌之兵力，形成拳头，以众击寡。如情况相反，即应“逃之”“避之”。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后来他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十分明显，后者是直接继承了孙子“十则围之”“十攻其一”的策略思想。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实力有所增长，但面对的却是更为强大的日军。《论持久战》写道：“我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阵地战，采取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以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就是采用灵活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歼敌的。“敌兵虽少，乃是强兵（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不是士气），因此，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我不但应以多兵打少兵，从外线打内线，还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内线的相持的防御战”，这是总体的战略方针。“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多打少兵”，这是战役和战斗的作战方针。两者相反相成。

及至解放战争时期，我已拥有雄兵百万。但毛泽东仍再三著论，坚持集

针。战争的第一年，以战略防御为主，让敌方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等一大批城市，但却坚持了每月平均歼敌八个旅。第二年转入战略进攻。在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后，我军恢复了失地，开始把战线推移到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到第三年，我军不但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已占居优势，于是放手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赢得渡江南进，解放全国的胜利。

毛泽东不只在专题军事论著中系统地论证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策略，而且直到晚年博览古籍，仍十分留意于此。如《智囊》论及李世民用兵：“唐太宗尝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也。”毛泽东就此加批，“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见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13页）纵然在承平时期，他仍然带着战略家的眼光，来审视古代战争的成败得失，特别赞赏在战役和战斗中以众击寡的用兵之道。

#### （四）“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毛泽东肯定孙子的格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解决战争中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的认识论原理。

《孙子兵法·谋攻篇》写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地形篇》写道：“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这就是说，只有认知敌军、我军、天时、地利的全部详细情况，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赢得战争的胜利。而在四者之中，最难测的是敌情。但也有探知的办法：“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生死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其一是进行认真分析，以探明敌方作战计划的得失；其二是挑动敌人，以摸清其活动规律；其三是示形诱敌，以察知所处地形的利弊；其四是进行战斗侦察，以窥测其兵力虚实。此外，还可“用间”：“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这就是说，要事先察知敌情，既不可迷信鬼伸，也不可比附往事或者借助于星象占卜，只有派人打入敌方从内部刺探军情。综上所述，有四点是有意识地通过各种实践活动来揭示敌军的内情与活动规律。

围绕“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中心思想，孙子就如何全面地了解敌我双方情况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它既表征了从矛盾双方去观察事物的辩证法思想，又表征了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但只会背诵马列词句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却无视这一切，竟然斥责《孙子兵法》是过时的东西，应为“蒋介石所专有！”

毛泽东到达陕北时，他整个思想体系（包括军事思想）正进入一个日臻成熟的新阶段。新阶段的特点是：第一，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需要对包括军事工作在内的长期革命斗争经验进行一个系统的总结。第二，他开始有条件研读一系列新哲学著作，以之作为方法论，将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第三，获读《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军事名著，可以作为总结革命战争经验的借鉴。

从主观方面来说，他于此时发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明确提出：

---

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等文件。



法》，他作了认真钻研并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后，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他特别强调，只有在两个阶段中，都尽力“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并且运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才能真正解决战争中主观与客观的矛盾，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怎样“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呢？毛泽东说：“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和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于此，他明确地提出了知彼知己认识过程的四个相互联系的具体环节，同时提出了每一个环节的基本要求与方法，从而揭示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之能动的飞跃进程。这样一来，他就把孙子提出的原则进一步深化，并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融为一体。

历史发展从来不是直线前进。平面看去，呈波浪形，而立体地透视，则曲折为螺旋。人类思维的发展，亦复如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引论》中说：“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对毛泽东建国以后的思想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作历史考察时，尤其要善于运用辩证的方法，密切注视其前进运动与回归运动的相互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对许多扑朔迷离的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解答。

## 十二 攻读于菊香书屋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毛泽东在这个会上作报告，提出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方针和建国以后的路线和政策。他的报告后来当作决议下达，成为新中国各项工作的指南。十天以后，他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启程前往北京。3月25日驻节于西郊香山的“双清别墅”。5月，从香山搬进中南海，毛泽东从此定居于丰泽园的菊香书屋。

中南海位于故宫西侧，原是帝王禁苑。中海开辟于金元之时，南海创建于明初，清代统称西海子，为皇家宴游之地。苑内碧波荡漾，绿树成荫，楼台相接，错落有致。“翡翠层楼浮树抄，芙蓉小殿出波心”。丰泽园大门面临南海，而菊香书屋的北面面临中海，毛泽东出门可在“海”边散步，进屋可静心读书和考虑国家大事。他爱上了这个古色古香的书屋。

菊香书屋是一个四方形的四合院，东西南北四面各有五间屋。北房正中一间是毛泽东的小会客室，靠墙排满了书架。东头两间是毛泽东的卧室，里面有一张特制的五尺宽的大木板床，半边床都摆满了书。那些书都是由图书管理员根据他的需要摆放的。隔一段时间，作一次调整。毛泽东有时躺着看书，在书上加批，或随手划些只有他自己懂得的符号。越是他心爱的书，越是批语满纸，浓圈密点，杠划不断，乃至杠外加框，字上叠字（铅笔字上叠写毛笔字）。

卧室靠北墙和东墙两面也是一排书架，这里放的都是他经常翻阅的书籍。北面西头两间屋原来是江青的卧室，江青搬出去以后，就变成了书房。还有西房的北头三间屋，南房的西头两间屋，后来也全都变成了书房。书籍分类上架，摆放井然有序。据估计，藏书总数达六、七万册，俨然是一个小型图书馆。

毛泽东收藏和阅读的书籍，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

### （一）工具书与马列著作

毛泽东使用得最经常的工具书是《辞海》与《辞源》。1947年从延安撤退时，他随身带着一部袖珍本的《辞源》。解放初期，还继续使用，在上面留下了各个时期圈划的笔迹。由于袖珍本的字体大小，后来换上了一部字体较大的《辞源》，一直使用到晚年。

《辞海》也是在延安就有的，而且使用得更频繁。转战陕北时，有一次因敌情严重，需要轻装，便把它埋藏起来，以后再没找到。进京以后，才重新添置。1957年，毛泽东见到原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便说：《辞海》我二十年前使用至今，现在这部书太老了，希望修订一下。后来经过专家们的十年努力，修订本的《辞海》于1965年问世。毛泽东觉得修订本还是过于简

## 批读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早在1920年，毛泽东就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等三本书，并自称领会最深的是“阶级斗争”四个字。他一生事业的兴衰成败，盖植根于此。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读过《反杜林论》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读列宁的这些著作，有助于掌握斗争的战略和策略。进入延安以后，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上海等地出版的马恩著作，诸如《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及莫斯科出版的《列宁文选》、《理论与策略》等，他才有机会读到。

在延安时期，经他圈划过的马列著作，留下来的并不多，但30年代苏联的红色教授们阐释马列哲学的著作（中译本），都保留得相当完备。而且几乎每本都经过精心研读，随手写下了自己的心得体会。现在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就是当年批读的原始记录。而《实践论》、《矛盾论》则是在批注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的创新之作。如果把读30年代苏联哲学著作的《批注集》同“两论”作一番“由此及彼”的对勘研究，便可以看出他当年用力之勤与体会之深了。

进入北京以后，马恩列斯的全集、选集、单行本、大字本，陆续出版，一一进入菊香书屋的书库。还有各种阐释马列原理的第二手书，更是目不暇接。往日在战争环境下，这些书来之不易，找来便如饥似渴地批读，直至废寝忘食。现在这些书得来容易，便失去了紧迫感，反而读得少了。

同时，随着形势的发展，他读书的重点也由哲学转向了经济学。1958年“大跃进”时，毛泽东下功夫钻研《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读了四个本子。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又组成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边读边议，毛泽东发表了许多意见，后来小组成员整理成了两种笔记：一种以原书章节为序，记录了他的谈话；另一种按问题归纳了他的谈话内容。遗憾的是，毛泽东再也无法像延安时期发愤攻读哲学书那样，通过批注或笔记而形成自己的经济学著作。

毛泽东早年对中国传统哲学作过相当认真的研究，在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五四时期，他提出要通过改造哲学以改造社会的主张。在延安研读苏联30年代哲学著作时，作了很多意蕴深刻的批注，接着便写出了“两论”那样成熟的著作，这些成就显然同他自幼形成的哲学兴趣分不开的。而对搞经济，他早年是看不起的。他的大同思想，甚至把工商业都视为多余。革命胜利以后，提出要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却并不熟悉经济规律。他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要看，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份看一遍。”（《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1日）他讲的两本书，代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并不全都是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成功了的，也并不一定适应于中国。毛泽东想跳出苏联模式，开辟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种愿望是好的。但他对经济建设本来不熟悉，加上又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因而后来便引向了一条比苏联模式更“左”的斜路。

毛泽东在延安的山沟里，曾经登上哲学领域的高峰；但建国以后，在经济领域，他的红旗几度摇落，乃至陷入民穷财尽的困境。1976年病重时，他要随侍身边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反复朗读庾信的《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沧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攻守有异势，术业

## （二）中国历史古籍

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毛泽东读得最多的是历史书。早在韶山的私塾里，就点读过《左传》、《史记》、《纲鉴易知录》。长沙上学时，又自学过《读史方舆纪要》和《资治通鉴》。延安时期，他于百忙之中，还亲自去听范文澜讲经学史。进京以后，他买了一套线装本《二十四史》，共八百五十册，全书四千万字。但他从头到尾通读过一遍，有些部分还反复研读过。如1959年在上海主持八届七中全会期间，他就重读了《三国志》的《郭嘉传》和《明史》的《海瑞传》。直到晚年病魔缠身，还在《晋书》上写下了“1975·8再阅”、“1975·9再阅”的字样。配合通读二十四史，毛泽东还结合研读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和各朝的纪事本末，这些书原先他都是读过的。特别是《资治通鉴》经常放在床头。这部书真是被他读“破”了，有一些地方都是用透明胶贴住的。

毛泽东不但自己认真读史，而且在百废待兴的开国初年，还抓紧组织史学家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

据谭其骧回忆，1954年冬，毛泽东曾同吴晗谈起，《资治通鉴》这部书，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现在还值得批判地研读。但旧本没有标点，不分段落，读起来不方便，市上也难买到。他提出要组织人力来做整理工作，出一种用标点、分段落的新本子。与标点《资治通鉴》相配合，他还提出要编一部历史地图。后来，这两件事都委托吴晗负责办理。标点《资治通鉴》的工作进行顺利，一年就完成了。《中国历史地图集》却十分费事，直到1982年才出第一册，1988年才出齐八册《图集》，毛本人都来不及看到。

{ewc MVIMAGE,MVIMAGE, !09101200\_00139\_1.bmp}

在二十四史中，毛泽东最重视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他指导刘松林（毛岸英的爱人）学历史，叫她从前四史读起。后来组织史学家标点二十四史，也从前四史入手。1959年4月，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写信给田家英：“主席指示标点出版前四史，去年起就紧张的进行这一工作。……现在送去《史记》排样两份，……如果方便，请转呈主席一阅。”前四史出来以后，范文澜、齐燕铭、吴晗、金灿然等又将其余二十一史（包括《清史稿》）全部整理出来，毛泽东深为赞许。

## （三）古典文学

毛泽东收藏和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包括诗词歌赋、小说戏曲、诸子散文、杂记随笔等，是极其丰富的。毛泽东故居图书管理小组的张贻玖，曾经汇编过一份毛圈阅批注过的诗词目录。其中包括1180首诗，378首词，12首曲，20首赋。总计诗词曲赋1590首，诗人429位。读过而未留下印记的还不知多少。（张贻玖：《毛泽东和诗》第2页）看这个统计数字，就可以从中约略窥见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的浓厚兴趣。

在诗词歌赋中，他特别爱好屈原的赋，三李（即唐朝诗人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和辛弃疾的词。

毛泽东自幼读书就爱作笔记，但在历经磨难之后，现在保存下来的早年读书笔记，只有四十七页。后面三十六页题名《讲堂录》，主要内容是听课笔记。前面十一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离骚》是一首长达二千字的抒情诗，代表了屈原创作上的最高成就。《九歌》是祭神的乐歌，充满

候的语文教师推左、孟、庄、骚为写文章的最高典范，同学们也都争相效法。但对毛泽东来说，他终生嗜读不倦的，莫如屈原的“骚体”诗赋。

屈原是“骚体”的创始人。篇中“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带有浓厚的湘楚地方特色。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以及汉代效仿“骚体”的作品汇成一集，冠名《楚辞》。东汉以后，相继出现了王逸、洪兴祖、朱熹、汪瑗、王夫之、蒋驥、戴震等多家注本。1957年，毛泽东曾经设法广泛搜集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研究《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多达五十余种，并对它们作了相当认真的比较研究。1958年，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1959年、1961年，他又两次要《楚辞》。1973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步美国总统尼克松之后尘来华访问，毛泽东送给他的礼品就是线装《楚辞》一部。

毛泽东终生好读《楚辞》，纯粹出于非功利的审美趣味。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其思维方式，自幼继承着王夫之以来湖湘文化的求实精神与独立根性；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其感情态度则远接以屈原为代表的湘楚的浪漫主义文化传统，两者交互作用，形成奇妙的结合。

毛泽东不但是一个古典文学的爱好者和欣赏者，而且是一个有很深造诣的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他的诗歌以粗豪的笔触和潇洒的气度，展现出“万水千山只等闲”、“乱云飞渡仍从容”的英雄气概，其诗品与人品了无判隔。文学界对此已有定评。

他对文学作品的评论散见于平日的讲演、谈话和书信之中，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性的，即通过评论作品来表达或批评某种政治倾向，诸如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975年《关于评水浒的谈话》等。还有一类则近乎学究式的，如1958年，他对贺知章《回乡偶书》所作的考证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原诗是：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刘少奇在一次谈话中，曾借此诗以论证古代官吏禁带家属，说明两地分居自古有之。毛泽东听了以后，觉得不妥。为此，认真查阅了《全唐诗话》、《唐书·文苑·贺知章传》等书，得出相反看法，并立即写信与少奇商榷：

少奇同志：

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八十六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由于明皇，可见彼此惬意。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摒弃眷属。但一个九十多岁像齐白石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着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家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得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上午十时

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二十四），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

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确据。

毛泽东从所读文献资料中得出两点结论：一、“儿童相见不相识”中的

说理明白。毛从来不屑于当一名书斋学者，但他的确具有文史学者所应具备的学养及运思、表达能力。

#### （四）自然科学与实用文化

毛泽东在 1913 至 1918 年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有重文轻理的倾向。他说：“这所新学校有许多校规，我赞成的极少。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没有好好地去学，所以大多数这些课程，我得到的分数很差……”从学校毕业以后，1921 年初，新民学会会友讨论个人的发展计划时，他表示，要在两年以内，设法补足自己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缺憾。但后来事与愿违，建党以后，繁忙的革命活动耗费了他主要的乃至全副精力，他不但在两年之内，而且终其一生，都无法循序渐进地进行自然科学的补课计划。只能从一般的报刊杂志中多少了解一些世界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动态。

1941 年 1 月 31 日，毛泽东写信给在苏联上学的儿子岸英和岸青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查鲁迅遗嘱中有一条是：“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岸英写信要诗。毛泽东是政治家兼诗人，不给寄诗去，却劝岸英，“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似与鲁迅对儿子预立的告诫有类似的意向。从历史背景来看，以王明为代表的一批教条主义者，都是苏联留学生，学的是社会科学，搞的是空头政治。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报告中嘲讽他们是一些“华而不实，脆而不坚”“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岸英、岸青当时在苏联学习，他也可能是担心儿子误入歧途，蹈教条主义之覆辙。

1949 年开国以后，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多次提出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性。1956 年，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但后来毛泽东并没能使这一方针得到认真落实。他自己曾经挤时间读过一些科学技术书籍，但数量有限。其中一部分是与当代中国科技发展的重点有关的。如 1959 年 1 月 2 日，苏联发射了一枚宇宙火箭，6 日，毛泽东就要来几本有关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科普著作来阅读。另一部分是与哲学有关的自然科学理论。他爱读《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力图从一个哲学家的视角来审视和吸取现代科学的新成果。此外，他还涉猎过李四光、竺可桢、杨振宁以及坂田昌一等著名科学家的某些新著。当他读了坂田《新基本粒子观对话》以后，非常重视其“基本”粒子可分的见解，并于 1964 年 8 月 18 日在北戴河对几位哲学工作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了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指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转引自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1986 年三联书店版，

他的这些见解，对科学家们进一步探索“基本粒子”以下层次的粒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美建交以后，1974年5月3日，在会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时，毛泽东表示，他为自己没有时间研究自然科学而感到遗憾。其实，除了缺乏时间和某些客观条件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难免受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局限。

中国是世界几大古老文化发祥地之一，但近代却落入不发达国家的行列。所谓不发达，主要是科学不发达。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具有实用理性的特点。学者不致力于探求自然的规律，而究心于协调人际关系。思辨理性与科学实验成为缺门或弱项，而兵、农、医、艺等实用文化却曾得到长足发展，毛泽东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成长的，他涉足实用文化的请多领域，并有独到的创获。在长期战争中形成的军事著作是他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是冠古绝今的“兵法”奇葩。“大跃进”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虽告失败，但他在总结和推广传统农业技术经验方面的浓厚兴趣，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医学方面，他力排众议，提出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号召西医向中医学习，已取得相当可观的成效。在艺术方面，他热爱传统戏曲。一进城就观赏梅兰芳的《霸王别姬》、程砚秋的《荒山泪》和侯宝林的相声段子。直到垂暮之年，还坚持一连看几小时的电视戏曲节目。俗语说：“不会看的看热闹，会看的看门道。”他对京戏各个流派的唱腔和套路都相当熟悉，的确是懂得其中门道的。

从以上四个方面，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中国古籍自幼就有浓厚的兴趣。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这种兴趣受到一定的限制。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公开发出过“厚今薄古”的号召；他自己在菊香书屋的读书生活却恰恰相反，是“厚古薄今”的。在这种“内”和“外”的矛盾中，内在价值取向属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最终决定着他的整个文化心理结构与行为方式。

### 十三 古为今用

毛泽东对古与今的关系，除了发出过“厚今薄古”的号召以外，还提出过“古为今用”的口号。前者只对人而不对己，是内外有别的；后者既对人又对己，是表里如一，内外一体的。

“古为今用”，要求研究历史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为历史而历史”，而是着眼于为现实斗争服务。建国以来，毛泽东往往通过评论历史人物与作品的方式，来推动现实斗争。或以古人为范式，或以往事为殷鉴，或推陈以出新，或引古以筹今……其事例繁多，此处只能择要陈述。

#### （一）批《武训传》与《红楼梦研究》

1951年春，电影《武训传》上映，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写社论进行批判，这是开国以后第一桩震动整个思想文化界的大事。

电影《武训传》是由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一部历史故事片。主人公武训实有其人，他生活在清朝末年，主要事迹是行乞兴学，一生历尽屈辱艰辛，办起了三所义学，最终获得清朝皇帝的嘉奖，敕封为“义学正”。在武训身上既体现了贫贱者不甘愚昧无知而渴求提高文化的善良愿望，也反映出在长期封建统治下扭曲而成的自卑自贱、乞求恩舍的奴才性格。这部电影在1951年元月放映以后，两个月里报刊发表影评四十余篇，绝大多数给予好评，后

毛泽东一向关心文化事业，《武训传》上映不久，他就看了这部影片和报刊上的有关评论，并自告奋勇为《人民日报》撰写了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于1951年5月20日发表。

社论劈头就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

事隔四十年之后，重读这篇社论，仍然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武训传》和武训的批判，的确是眼明手快，开篇就揭破了问题的实质。全文析理分明，有助于人们分清“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毛泽东的眼光深透，与鲁迅晚年的杂文《难答的问题》（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569—570页）可以媲美。

然而，毛泽东的身份和地位与当年的鲁迅截然不同：一个是旧社会的叛逆者，一个是新中国的领导人；一个是只能化名用曲笔撰写杂文；一个可以用社论的形式向全国发号施令。他们同样批评武训，但作用和影响大不相同。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就提出了要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随着革命性质的转变，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批评资产阶级需要抓典型，毛泽东首先抓到的典型就是《武训传》。由最高领导人发话，各级组织层层传达贯彻，一开始就形成了高压的政治气氛。由于将学术问题当成了政治问题，因此，汹涌的批判潮流，既难免伤害一批《武训传》和武训的赞扬者；也必然要淹没一些专家学者有学术价值的批评意见。接着，又根据毛的指示，组成了包括江青在内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带着框框到山东省作了二十多天的调查并写出《武训调查记》，此调查经毛泽东修改定稿，在《人民日报》上连载，最后得出结论，说武训所办的义学，是“不义之学”。这个结论显然有很大的片面性，但在当时一面倒的形势下，谁能道半个不字？

毛泽东对《武训传》和武训的看法，有独到的见解，对文艺界与学术界很有启发，这是应该肯定的。但他将评论电影和讨论文化问题当成推动政治运动的工具，却使文化艺术事业迈不开健康的步伐。此后，每逢领导要发动什么运动，也多是到文化界抓典型，然后推广开来，上升为政治运动，此风有一发不可复收之势。

继《武训传》风波之后，是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红楼梦》是我国最优秀的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它一经问世，就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至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之美谈。晚清以来，学术界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已逐渐形成一项专门的学问，简称“红学”。“红学”大体上有两派，原先着眼于影射的索隐派，称为“旧红学派”。五四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称为“新红学派”。俞平伯研究《红楼梦》，受胡适影响，从考据入手，但在艺术分析上深入了一步，他是“新红学派”的佼佼者。1923年俞作《红楼梦辨》，是“新红学派”代表作之一。解放后，他将这部书修改、增订，于1953年更名《红楼梦研究》出版。同时，又把他在各报刊发表的有关评论汇编成册，题名《红楼梦简论》刊行。几十年来，俞氏潜心“红学”，对《红楼梦》原稿和各种版本的考证，思想和艺术的分析，以及人物形象的探讨等等，都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为



1954年，青年作者李希凡、蓝翎突破各种困难，先后在《文史哲》和《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 红楼梦研究 》两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与研究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俞作的根本问题是以自然主义的唯心观点来分析和评价《红楼梦》，抽掉了它的丰富的社会内容。他们并将俞平伯与胡适联系起来，说：“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除此以外，批评还涉及俞作对《红楼梦》的风格、传统性以及“色、空观念”“钗黛合一”等问题的理解，都是与根本问题密切相关的。

毛泽东自来好读《红楼梦》。李、蓝的文章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引进红学领域，他感到十分高兴，不但细心研读，并随手在文旁划了不少圈圈、杠杠和各种记号。他在批语中称赞《关于 红楼梦简论 及其他》是“很成熟的文章”，在李希凡、蓝翎的名字下批注道“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二岁，一个二十六岁。”1954年10月16日，他还为此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

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的这封信支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红楼梦》与古典文学，反对“大人物”压制“小人物”，为新生力量撑腰打气，并将斗争的矛头引向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但是，在具体分析上他注意了俞平伯与胡适的共同性，却忽视了俞平伯与胡适的区别性，俞平伯与胡适同属“新红学派”，但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胡适是“自叙传说”的首倡者，但俞平伯早在1923年的《红楼梦辨》中就说：“要知雪芹此书虽记实事，却也不全是信史。他明明说‘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荒唐言’，可见添饰点缀处是有的。”这与胡适的“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曹家“树倒猢猻散”的自然趋势，显然有所不同。1925年写《红楼梦辨的修正》，俞氏申明“最先要修正的”“是《红楼梦》为作者自序传这一句话”。并且说，文学创作是“经验的重构”，“既同出于经验里，又非同经验的重现”，经验在创作中是“复合错综的映现，而非单纯的回现”。这些话，表明他那时就已不赞成胡适的“自叙传”说，而且他论述文学创作与经验的关系比较客观全面，如果在正常的学术讨论中，有些问题都不难通过反复辩难与商榷，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但当时一经最高领导人作出归属胡适唯心派的定性判断，俞平伯的研究成果就一律

学术界虽然在报利上发表了连篇累牍的文章，但都形同“奉旨申斥”，调子基本一致。

通过批判《红楼梦研究》，形成了一条从文化讨论转向政治批判的惯性轨迹，接下来，对胡适与胡风的批判，便出现了波涛汹涌的更大高潮。这里不必一一细表。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爱好和关注历久不衰。一场批判过后，他还屡屡谈到《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这里提到《红楼梦》，显然带有一种自豪感。1962年1月，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他还分析了《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毛泽东经常讲要把《红楼梦》当历史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了解产生《红楼梦》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而了解《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如何反映历史发展的进步要求。

在封建时代，所谓历史发展的进步要求，就是反封建的“民主性”或“人民性”。1958年，毛泽东在审订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补进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

对《红楼梦》的民主性或人民性作何理解呢？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能理解作者及书中的主人公对大观园中被奴役、被侮辱和被迫害的人们的深切同情。1961年12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将《红楼梦》和《金瓶梅》加以比较。他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1962年8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他还说：《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这些话，对研究《红楼梦》与《金瓶梅》的继承关系，发掘它的人民性或民主性的精华，都是有启发意义的。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的思想进一步向“左”转。1963年5月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红楼梦》。他说：“最先写四大家族的是曹雪芹。《红楼梦》写的是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他们是奴隶主，三十三人。写奴隶，如鸳鸯、晴雯、小红等，都是很好的，受害的是这些人。林黛玉不是属于四大家族的。”

接着，1964年8月18日，他在北戴河同几个哲学工作者更具体地谈到如何运用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红楼梦》。他说：“什么人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

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转引自龚育之、宋贵仑《“红学”一家言》，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0—221页）

在此之前，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已明白无误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他无需乎再像1954年那样借助文学评论的形式来打开阶级斗争的缺口，缺口早已打开，他的这番红学谈话不过是阐述基本路线的辅助手段。因此，当时在理论界学术界和文艺界都没有引起什么新的风波。

《红楼梦》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总纲或主题是什么，应该如何读？人们的视角不同，看法容或不一。毛泽东以小说为自己的政治观点作论证，信手拈来，自然成趣。即从学术方面来说，他也确有独到的见解。只要不把他的话当作真理标准，作为“红学”一家言，何尝不好？不幸的是，毛泽东的这些话流传到“文革”时期，一概变成“最高指示”。特别是在1973至1974年的“评红热”中，抓住毛泽东的片言只语，不少人写文章计算大观园一共死了多少条人命，贾府有多少血泪帐，每天挥霍了多少银子；用“交租单”“高利贷”“吃、穿、住、行”等经济细节的罗列统计，代替了对艺术形象的具体分析，这就引向了庸俗社会学的歧路。至于将第四回作总纲，也有相当道理。因为第四回“护官符”揭示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典型环境。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要抓住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如果不着意于揭示人物性格的奥秘，只是在环境上兜圈子，那就难以升堂入室。

1973年10月和12月，毛泽东两次在重要会议上提出《红楼梦》是写政治斗争的。说作者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是掩盖的。此说一出，梁效和大小报刊，便纷纷为此作注疏，将爱情划为禁区，硬说曹雪芹“千方百计用‘谈情’来掩盖书中描写的政治斗争”，还说这是《红楼梦》的“特殊的艺术表现手法”。其实，借男女写君臣，借爱情写政治，原本是索隐派的故技，如此反复转悠，岂不又落入了“旧红学派”的窠臼？！

## （二）“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毛泽东早年崇信圣贤创造历史，他把人分为圣人、贤人、愚人三等，称颂“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到晚年，他虽然在潜意识的层面上，保留着圣贤创世说的深刻影响，但在显意识的层面上，却按照自己的阶级斗争理论将人们划分为贫与富、贵与贱、长者与少者、大人物与小人物、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并积极宣扬“奴隶史观——造反有理论。”《贺新郎·读史》就是这种历史观的集中表现：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 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1958年发动“大跃进”时，他在成都会议（3月23日）上说：自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年轻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他历举外国的释迦牟尼、耶稣、马丁·路德、达尔文、马克思，中国古代的孔子、颜渊、屈原、贾谊，近代的康有为、章太炎、邹容等一大批人物，说明青年人一旦抓住真理，就敢于藐视古董，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在同一时期，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钱崔使君序》，兴来时写下了一千多字的批语。其中除考记王勃的经历以外，还把王勃的文学成就同其

之外，还有牢骚满腹一片。”王勃的早逝，触发了他更多的感慨：

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三，王弼死时才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转引自张贻玖《毛泽东和诗》，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

这段卷头眉批强调“贫贱低微”受压抑的地位是形成“生力旺盛”“敢想敢说敢于”的创造精神的内在动因。它继承了“不平则鸣”“诗穷而后工”的传统学观念，而又把它扩展到文化创造的各个领域，终于作出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独特论断。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经常讲“破除迷信”，就是要破除对“高贵者”的迷信。稍加分析，似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破除对帝国主义的迷信。

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分析国际形势。他说，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他认为新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他一连举了十件事来论证“东风压倒西风”。

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还运用思辨的方法来阐明“东风压倒西风”的道理：“我问过在我身边的一些同志，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都摇头说，不是的，住在地上，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在地球上看到别的星球是在天上，若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一看我们，不就是在天上了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天上，同时又是住在地上。中国人喜欢神仙，我问他们，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神仙是住在天上的，我们住在地球上也即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若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不把我们看成神仙吗？第三，问他们中国人算不算洋人？他们说，不算，外国人才算洋人。我说，不对，中国人也叫洋人。因为我们看外国人是洋人，外国人看中国人不也是洋人吗？”在这里，毛灵活地运用了他所擅长的辩证方法，阐明矛盾双方——天上和地上、神仙和凡人、洋人和土人——的地位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由此得出结论，洋人，包括帝国主义在内，并没有什么可怕。

第二，破除对苏联模式的迷信。

1956年，苏共二十大系统地揭露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和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此十分关注，并力图从中吸取教训，另辟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在这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到1957年，两类矛盾大量暴露出来，毛泽东由于对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造成反右严重扩大化的错误。自此以后，毛的思想急遽向“左”方倾斜。一方面，提出要继续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另一方面，又决心否定苏联模式，通过土法上马和大搞群众运动来发动“大跃进”。

195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对照搬苏联经验提出了相当系统的批评。当回溯过去的历史时，他说：“中国革命是违背斯大林

大一切革命力量，建立新中国。与王明的争论，从1937年开始，到1938年8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纲领，王明提六大纲领。按照王明即斯大林的作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胜利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我们不辩护，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

毛泽东认为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是一个重要转折，“精神上没有压力了，因为破除了迷信。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继续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

但是，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他说：“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他还提出“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批判斯大林，解除了长期以来的精神压力，使他感到高兴。但反对个人崇拜，可能削弱他的领袖地位，也可能还与他潜意识中的“圣贤创世论”相抵触。因此，他又为这种新的压力而感到担忧。

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同赫鲁晓夫及苏共领导人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而这两个问题又都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因此，毛泽东在1958年4月的汉口会议上说：“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破除迷信，以为外国人学得好，洋人都是了不起的。……这是一种迷信。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看不起自己，什么东西都是别人行，自己不行。”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中，要破除对洋人的迷信。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也要破除对洋人的迷信。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还提出，建国以后，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各方面都受到来自苏联的广泛影响。经济领域的计划工作、重工业建设、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照搬苏联经验，尤为突出。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迷信洋人。缺乏独创精神。他提倡学习应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他认为，规章制度是繁文缛节，上层建筑都是“礼”。他反复强调要打破各种束缚创造精神的规章制度。

第三，破除对专家学者和教授的迷信。

五十年代前期，毛泽东接连发动了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以及对胡适、胡风的批判，采取的是解剖麻雀、教育一般的办法。只有胡风等极少数人划入敌我矛盾，多数知识分子则主要是从中接受教育，改造思想。1957年的反右采取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办法，给几十万人带上了取不掉的紧箍咒。1958年发动“大跃进”时，毛泽东于3月20日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重新分析了阶级状况，认为中国有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右派，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无心无意”；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是指右派以外的那些人，他们对我们新中国是半心半意的。同年11月12日，他又在武昌会议上说：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为了从政治思想上消灭剥削阶级，首先就得把那些“无心无意”的右派“搞臭”，在他们彻底孤立以后，再加以分化瓦解。1958年4月6日他在汉口会议上提出的办法是：“开右派大会，他们料不到有这样的事情，就等于皇恩大赦。各大城市（30万人口以

拉一拉。训则凄凄惨惨，冷冷清清，拉则全身热，通身舒畅，指明前途，使他们有希望。”他想用这种一打一拉的办法，把其中少数人分化过来。

至于那些“半心半意”的专家和教授，则是团结的对象。但要团结和改造他们，首先得破除对他们的迷信。

1958年3月23日，毛在成都会议上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的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龙恩的残余。我看不能忍耐了。”

为了破除对教授的迷信，他提出了许多具体办法，诸如：领导干部到大学当兼职教授，与书斋学者共比高；中央和省委办理论刊物，搭班子写理论文章；各级领导种试验田，做出高产样板；炼钢土法上马，大搞群众性的炼钢运动；层层办红专大学，培养又红又专人才；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提倡标新立异；插红旗，拔白旗，辨明前进方向；发动采风掘宝，人人写诗作歌；……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的心情特别愉快，话也讲得特别多。单单成都会议就作了六次讲话，插话还有不少。但千言万语，归结到一点，就是为了破除对“高贵者”的迷信，解放群众的能量。正如1958年5月5日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首次讲话中所说的：“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我们的办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这一段话比较鲜明地表达了他致力于破除迷信和发动“大跃进”的指导思想。

### （三）《张鲁传》批语

毛泽东是农家子弟，从小目睹旧社会贫苦农民在封建统治下终年劳动，不得温饱的悲惨处境，早就立下了要以革命手段砸烂旧世界、按平等与平均原则建立一个大同社会的宏伟抱负。五四前后，他有过无政府的梦想，作过“工读互助”的尝试，还设计过建设“新村”的详细方案。革命战争年代，他所领导的工农红军，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他觉得那是非常美好的一段生活。进城以后，以苏联为榜样，改行薪金制、军衔制，他认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法权”，是倒退而不是前进。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他消除了对苏联经验的迷信，试图构思一个更新更美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构思的过程中，早年梦寐以求的大同理想又重新浮现在眼前。大同理想如何实现？最新最美的图画如何着笔？他的想法集中到一点，就是搞人民公社。

早在1955年加速推进农业合作化时，毛泽东就有将农业社规模加以扩大的打算。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又提出了小社并大社的问题。4月，根据他的意见，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5—6月，由河南遂平县、平舆县带头，将农业社归并为六千户至九千户的大社。

7月1日，陈伯达在《红旗》第三期发表《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文中提出：“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就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7月16日，陈伯达又在《红旗》第四期发表了他在北京大学为纪念中共诞生三十八周年所做的报告。这个报告传达了毛的重要指示：“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

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

8月上旬,毛泽东到河南、山东等地视察时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它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同志视察山东农村》1958年8月13日)从此,“人民公社好”的呼声响彻全国上下,各地都出现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到月底,有的省便实现了公社化,有的地方甚至声称他们的公社已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戴河举行,会上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在北戴河会议所作的讲话中,他还意味深长地说:“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我们要实行。”北戴河会议之后的三个月,出现了大办公社的热潮。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混乱情况。于是,接连召开了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着重纠正“共产风”。这几个会议都是降温的会议。全会并作出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强调要把革命热情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然而,降温的幅度是有限的。相反地,在这三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连就《张鲁传》作了批语和谈话,所吐露的恰恰是“实行空想社会主义理想的”的急切心情。

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说:

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里吃饭、吃内部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头搞。他搞了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由来已久了。

这是第一次提到张鲁,着重讲“吃饭不要钱”,称赞那是由来已久的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作风。

同年12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又翻读《三国志·张鲁传》,并于7日留下随手批写又随手涂掉的一段批语: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多了。

在这里,他把张鲁的神道治病同人民公社的群众性医疗运动,“置义舍”和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联系起来进行探讨。写上又涂掉,可能是嫌这段话还不足以准确地表述他读《张鲁传》所引发的许多思绪和联想罢!

三天以后,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开幕的那一天,“毛泽东又重读了《张鲁传》并作了近三百字的一段批语: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更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如,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待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

这一段批语,看来是经过反复斟酌的。他用“吃饭不要钱”“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之类的新创词汇来诠释《张鲁传》,将汉末的五斗米道与当代的人民公社作了多方面的比较,这件事本身就清楚地表明:在小农经济土壤

心内容与根本线索。虽然毛泽东对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共产风”有所警惕和批评，并曾采取措施，纠正已经察觉到的某些明显失误。但是，他的灵魂深处，却仍然对历史上的五斗米道有着衷心向慕与依恋之情。他力图从那种平等与平均的理想出发，形成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政策。这种“左”倾理论与政策 1959 年遭到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广大干部与群众的批评和抵制，但他却反而把这些统统当作阶级斗争加剧的证明。因此，每一次纠“左”的努力，反而带来“左”倾升级的恶性循环。1962 年初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工作报告对前段“左”倾错误作了较为认真的反思，毛泽东又疑窦丛生，自此逐渐滋长了对刘少奇和中央第一线的不信任感。1964 年 12 月至 1965 年 1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全国工作会议，总结和研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主要矛盾的提法出现分歧。此后，中央一线的工作仍由刘少奇主持，但是毛泽东遇到问题不再与刘少奇及中央第一线通气，而是积极支持林彪的“活学活用”与江青暗中策划的写作活动。中共中央表面上还是一个统一体，但实际上已开始走向分裂。这种分裂，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权力斗争。应该看到。权力斗争的背后，的确有思想路线和文化取向的分歧。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的失误，毛、刘都负有责任。大跃进和公社化失误以后，刘少奇等开始进行比较认真的反思与纠偏，毛泽东却仍然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恋恋不舍。矛盾与分歧有逐渐加深之势。如何解决矛盾，清除分歧呢？毛泽东经过长期的苦思焦索，终于决定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 十四 以乱求治

毛泽东在 1976 年病危之际，曾召见华国锋、王洪文、江青等人倾诉衷肠，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赶走蒋介石；第二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足见“文革”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从表面看去，“文革”似乎是对传统文化的破除；但从深层来看，无论是它所追求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模式还是乱中求治的战略，都深深地打上了传统文化的烙印。下面我们将约略对毛泽东策划、发动和维护“文革”的有关言行作一些论析。

### （一）真假海瑞与钟馗

大跃进的狂热，不但带来了经济困难的严重局面，而且也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由于党风不正，干部和群众都不敢讲真话。一旦领导决策失误，就难以得到纠正。毛泽东为此深怀隐忧。1959 年 3 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看了湘剧《生死牌》，戏的结尾出现了海瑞。于是，他把《明史》找来，讲了一段直言敢谏的故事。接着又在 4 月初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出学习海瑞的问题。他说，海瑞写给皇帝的信，意见很尖锐，那是很不客气的。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高明多少。广东出了个海瑞（海瑞是海南岛人，当时属广东省），很有荣誉。他还说，已把《明史·海瑞传》给彭德怀看了，并劝周总理也看一看。他号召我们的革命干部“要有像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他并且指出，各级干部不敢坚持真理，无非是“怕”。为此，他提出要有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此外，他还提出要找研究历史的人写宣扬海瑞的文章。

八届七中全会过后，胡乔木将毛的讲话精神转告吴晗，吴晗对《明史》研究有素，便欣然命笔，写出《海瑞骂皇帝》一文，用刘勉之的笔名，于 1959



木审订。乔木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庐山会议之后，才来得及审读。此时风向不变，报刊上已开始出现《真假海瑞辩》一类文章，说彭德怀是假海瑞，真魏延。吴晗出于知识分子对政治运动戒慎恐惧的心理，加上乔木的婉言敦劝，便在文后加上一条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尾巴，以示与彭德怀的“假海瑞”划清界限。此文于9月1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读过这两篇文章以后，就来找吴晗，开始是请他讲海瑞，接着是请他编写剧本。1960年，这位历史学家终于“破门而出”，耗费一年心血，七易其稿，写成京剧《海瑞罢官》。剧本全文发表并公开演出后，受到各方热切关注。报刊上由此而展开了关于历史剧、清官问题的讨论，学术界一时呈现颇为活跃的景象。

“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韩非子·说难》）吴晗曾经把自己的剧本比作一块砖头，说可以抛砖引玉。但这块砖头一旦碰到龙的逆鳞上，就可能惹出大祸来。对这一点，他似乎认识不足。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报告，向全党全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针对李建彤写的历史小说《刘志丹》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江青抓紧这个时机，在北京找人写文章批《海瑞罢官》，但未成功。

1965年2月，江青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到上海与柯庆施、张春桥密商，决定由姚文元执笔写批判文章。姚文元一口咬定《海瑞罢官》的主题与“退田”有关，以便与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批“单干风”联系起来。文章十易其稿，毛亲自审阅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便于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号。

姚文元把《海瑞罢官》与三年困难时期的“单干风”联系起来，帽子已经扣得很重，但康生还以为未足，他要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于是，便引出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人的谈话：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转引自薄一波《文化领域的大批判》，见《新华文摘》1993年第10期，第63页）此言一出，要害从“退田”转向“罢官”，政治批判的性质更尖锐了。江青便踌躇满志地说：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后来，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说：“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这就和盘托出了批《海瑞罢官》的指归。

从1959年初的提倡海瑞精神，到1965年的批《海瑞罢官》，悠悠六度春秋，方向盘已经旋转180°而朝向反面。当毛泽东说“彭德怀也是‘海瑞’”时，彭德怀已然是一只死虎，矛头实际上指向了彭真—刘少奇。为了推出《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江青上窜下跳，使尽了全身解数。后来她在特别法庭的被告席上曾经说过：我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毛泽东叫我做的。我是他的一条狗，他说要咬的，我就咬。此话未可全信。不过，就批判《海瑞罢官》以发动“文化大革命”而言，她的行动的确得到毛的有力支持。

如果说，《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是公开发出的信号。那么，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写给江青的信，就是对“文革”所作的战略部署

其一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来一次。”（《毛泽东致江青信》1966年7月8日，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6页）这是根据治乱循环的传统历史观所制定的战略方针。1917年毛泽东读《伦理学原理》时就写过这样的批语：“治乱迭乘，和平与战争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半个世纪以后，他又回归到了这种历史循环论，并决心通过动乱来摧毁他认为已经变“修”了的党和政府机构，然后重建他理想中的最美好最纯净的大同社会。1962年8月，他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要承认阶级斗争长期存在，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这样的动乱与重建，要重复多次，每隔七八年要来一次。为什么不采取和平的方式而要采取制造动乱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呢？他的回答是：“树欲静而风不息”，“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这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自1957年反右以后，他经常讲这类话。直到晚年，还给身边护士孟锦云讲过武则天的故事。据云，一位大臣见武则天经常杀人，就向她提意见：你这样杀人，谁还敢当官呀？当天晚上，武则天叫人在殿台下点燃一炉火，四面的飞蛾见火便纷纷扑来，飞来多少，就烧死多少，可还是不断有飞蛾扑来。武则天笑着对那大臣说：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本性难移嘛！毛泽东多次提倡“鸣放”，又多次发动所谓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同武则天说飞蛾扑火一样，他相信牛鬼蛇神总会自己跳出来。他认为，经济上的阶级消灭了，还有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他主动发起的一场政治思想上的革命。其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以“天下大乱”为手段，以“天下大治”为目的。

{ewc MVIMAGE, MVIMAGE, !09101200\_00175\_1.bmp}

但是，毛泽东对自己控制动乱的能力估计过高，而对“文革”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则估计不足。他发动文革，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打开了宝盒一样，从中飞出各种灾害、祸患和疾病的小妖，造成天下大乱。但毛泽东想了各种办法，再也无法把这些小妖收回到宝盒中来，达到所谓“天下大治”的目的。这是他的终身憾事。

其二是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同上，王年一书）

按钟馗辟鬼之说，始于唐明皇，此后长期在民间广为流传。毛泽东那时就看出林彪宣扬个人崇拜，是想借毛作为钟馗来打倒刘少奇和中央第一线。当时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所以毛甘愿充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共产党的钟馗”。1963年，毛泽东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并且认为，还需要有更多的个人崇拜。林彪的活动满足了这种需要，因而受到毛的青睐。

从历史上看，中国有几千年皇权统治的传统。毛泽东虽不崇拜皇帝，却崇拜圣人。五四以后，他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晚年经常宣扬奴隶史观，但“圣贤创世论”仍蛰居潜意识的深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1943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赋予毛泽东以最后否决权，这已向个人崇拜跨出了危险的一步。但当时毛泽东谦虚谨慎，并不滥用最后否决权，因此，革命事业顺利发展，领袖威望日益提高。

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中共八大也提出要反对个人崇拜。新的党章删掉了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也不再提毛个人的最后否决权。然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发展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和个人专断的作风。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他并且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

和崇拜个人混淆起来了。马列原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是科学，需要认识和掌握，运用和发展。但不宜提倡“崇拜”，因为一提崇拜，就把它变成了偶像和教条，尤其不能提“永远崇拜”，因为科学总是要向前发展的。

1959年的庐山会议，批判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彭德怀，让林彪出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林彪一上台，就积极宣扬个人崇拜。首先提出学毛著是学马列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然后，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又作了别出心裁的讲话。他把发动“大跃进”的错误，说成是“精神收入”“很大很大”，付点学费是值得的，然后分析造成错误的原因，说主要是其他人把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拉到“左”边去了。最后说：“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转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1页）正当毛泽东工作严重失误时，林彪极意为他文过饰非，毛果然十分欣赏。他对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回答：我作不出。

“文革”开始，林彪除了大讲“政变经”“反复辟”以外，还说：“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准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信，对林彪的讲话，感到有些不安。但为了共同“炮打司令部”，宁愿暂时当个钟馗。其实，他内心是很矛盾的。“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们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上引王年一书）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林彪上升为副统帅。他的一伙人，得志更猖狂，发明了许多类似宗教仪式的东西，诸如“早请示”“晚汇报”，设“宝书台”，跳“忠字舞”等等。同时又称颂林彪最“高举”。理所当然，群众要“紧跟”，便首先要“紧跟”那举得最高的“副统帅”。对他们搞的所谓“大树特树”的一套，毛泽东渐渐不耐烦了，他说：名曰树我，不知树谁，说穿了，是树他们自己。

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这次会议的首要议题是为修改宪法作准备，其中涉及到是否“称天才”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早就主张不“称天才”，不设国家主席。陈伯达与林彪一唱一和，试图以“捧杀”的方式夺取最高权力。毛泽东为了挫败林彪夺权的计划，决定先从陈伯达开刀。8月31日，毛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转引自上述王年一书）

批陈以后，林彪深感前途叵测，如坐针毡。随着他的武装政变阴谋破产，便出现了自我爆炸的“九一三事件”。批陈随即转向批林。此时党内传达了毛泽东在1966年给江青的信，表明毛对林彪的野心早有察觉。他们暂时联手，不过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及中央第一线。目的既达，联盟自然崩解。不过，按照治乱循环，“七八年来一次”的理论，打“鬼”正未有穷期。刘少奇是第一阶段按计划被打倒的，林彪是第二阶段因抢班夺权而被摔死的，江青是

是不攻自破？

## （二）《五七指示》

1966年5月6日，林彪给毛泽东送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第二天就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发展罢了。

毛泽东 1966年5月7日

中共中央于5月15日将这封信转发全党，并在通知中说：“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这个文件下达的第二天，又发出了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按毛泽东的意图，“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五一六通知》主要讲如何破旧，即摧毁已经变“修”了的上层建筑，“砸烂旧世界”。《五七指示》则主要讲如何立新，即展露“建设新世界”的蓝图。

毛泽东的理想蓝图，可说是由来已久。1919年的《学生之工作》，作过写意的描绘。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进行了全国规模的大胆实验。这一次的《五七指示》，在公社化运动受挫之后与“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发出，更有不同寻常的含义。

1958年发动公社化运动时，毛泽东说：“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些，便于领导。”《五七指示》的“大学校”则不但把各行各业合在一起，而且还要取消固定的分工，实行“亦工亦农、亦文亦武”，以便消灭差别，使每一个人都成为“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能写文章”（见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十分明显，这是以返回自然经济作为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它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背道而驰的。

的发展水平相联系。人类在原始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原始村社的人们共同进行同一种劳动，当时只有按性别、年龄进行的自然分工，而没有专业殊途的社会分工。后来随着金属工具的制造及其广泛使用，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于是逐渐从农业中分化出工业，乡村中分化出城市，体力劳动者中分化出脑力劳动者。三大差别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样，将来也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才有可能消灭三大差别。但毛泽东却不顾客观条件，急于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尽快地消灭三大差别。由旧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干部轮流进“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并管理大、中、小学；城市居民下放农村劳动；如此等等。从总体上看，《五七指示》正是将农村人民公社的模式进一步向部队、城市和文教领域推广和发展。其基本精神，是提倡城市向农村看齐，工业向农业看齐，脑力劳动者向体力劳动者看齐，总之，是以向后看齐的办法来消灭三大差别和实现平等与平均的“大同”理想。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1958年人民公社的构架，工、农、商、学、兵五业俱全，到《五七指示》的“大学校”就只有工、农、兵、学，抽掉了商业一行。虽只一字之减，但关系重大。

“大跃进”升温时，毛泽东提出过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的主张（1958年8月毛泽东在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降温时又说过，中国的“商品生产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见《政治经济学笔记》）

但是，经过60年代关于反修防修的反复思索之后，他下定了决心，要逐步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制度。《五七指示》的“大学校”，就是一个消灭了商品的、自给自足的“理想社会”。从《指示》发表，一直到离开人世，他在这个问题上再没有出现反复。

“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和“文革”受挫之后，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六十年》，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644页。）他对“文革”没有能彻底“砸烂旧世界”和重新建构一个纯净美好的“新世界”感到深深的遗憾。

同年12月26日，毛泽东又对周恩来和王洪文作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谈话表明，“文革”在实践中遭受惨重失败之后，他仍然执著地追求最纯净美好的“大同”理想，并从这种理想出发，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论述和列宁关于小生产的论述作了很深的误解，乃至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八级工资等，看成与资本主义差不多，提出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毛泽东的这些谈话，比《五七指示》更具理论色彩，但他的语调相当低沉，不复像发出《指示》时那样充满信心了。

活动的时间长达 60 年。他的著作等身，而最集中地表达其“大同”理想的则莫如：早年的新村计划；发动公社化运动时写的《（张鲁传）批语》；发动“文革”时写的《五七指示》；“文革”后期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等等。将这些文件联系起来思考，可以清楚地看出，追求平等与平均的“大同”理想，是贯串始终的一根红线。

“大同”理想的经济背景是生产力低下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这种理想源远流长。《礼记·礼运篇》就作过经典式的表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运篇》的作者，假借孔子的名义，依据古代传说，确认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互助互爱，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大同”之世。但后来出现了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因此，就需要用“礼”来维护社会秩序，消弭战乱。禹、汤、文、武、周公、成王都属于这种“小康”之世的圣人。

《礼运篇》虽把“大同”当成一去不复返的“太平世”，但它却仍能激起历代进步思想家、社会改革家的热情关注和向往。直到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康有为、孙中山，都以“大同”理想作为激励社会改革和革命的口号。特别是康有为还在《注礼运》的基础上撰著《大同书》，详细地描绘了他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消灭了家庭，婚恋绝对自由，男女完全平等独立。由社会设立育婴院、恤贫院、医疾院和养老院及各级学校，来解决人们从幼到老的生活、医疗和受教育等问题。消灭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实行公农、公工、公商，为全社会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因此，它是一个公产的、“无有阶级”的社会。消灭了国家，撤销了法庭、监狱和军队，“大同公政府”由选举产生，它的主要职能是用来管理经济文化和各种公共福利事业。

毛泽东早年一度崇信康有为的三世大同学说。他在 1917 年 8 月 23 日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两年后，他撰写《学生之工作》，所陈述的“新村”构想，更反映了《大同书》的明显影响。三十年过去，毛泽东经历长期艰苦斗争取得了革命胜利，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的路。”贫苦农民与“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不同，他们在逼得走投无路时，往往用揭竿而起的暴力行动，打破封建统治，按照“平等”“平均”的理想，建立过短暂的革命政权。张鲁的“五斗米道”，以神道治病，设义舍，置义米、义肉维持政权达三十年之久，毛泽东多次加以称赞，把它视为“社会主义”的老传统。他自己所领导的新式农民战争，也实行过“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诸如军队和干部的供给制，群众中的互助合作，都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新传统。毛泽东十分珍惜这种新、老传统和纯净美好的“大同”理想。但他愈来愈觉得他亲手缔造的新中国，既丢掉了战争年代的好传统，又未能奔赴他所衷心向往的“大同”理想。为此，他不惜发动“文革”加以“砸烂”，按《五七指示》进行重构。直到临危之际，还谆谆告诫全党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为身后可能有人起来否定“文革”而忧心忡忡。“文革”开始时，他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路。后

---

毛泽东 1917 年的三篇代表作是：《体育之研究》、《与黎锦熙论学书》、《〈伦理学原理〉批语》。

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见 1976 年 2 月 5 日中共中央通知《毛主席重要指示》）“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他毕生梦寐以求的“大同”理想实现无期，这就使得他暮年的心境显得格外悲凉孤寂。

### （三）批孔扬秦与评《水浒》

“九一三”事件过后，江青一伙发现林彪的住处悬挂着宣扬儒家格言的条幅：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克己复礼

毛泽东由此想到批林可与批孔相结合。1973 年春，他在一首诗中批评郭沫若尊孔：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同年 7 月 5 日，他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说：“郭老在《十批判》（即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再过一月，即 8 月 5 日，毛泽东给江青念了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_187\\_0/ESPL>](#)，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ewc MVIMAGE,MVIMAGE,!09101200\_00188\_1.bmp}

念完诗，毛泽东又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8 月 7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批发的杨荣国作《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8 月 13 日，又发表了杨荣国的《两汉时代唯物论先验论的斗争》。这两篇文章为批林批孔作了一定的理论准备。

8 月 24 日到 28 日，中共召开十大。在中央政治局开会筹备十大时，江青提出要将毛评述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谈话写入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暂不公开发表。但通过十大，江青集团在中央的力量有所增强。他们多方煽动批林批孔来制造新的动乱，影射、攻击周恩来，加快夺权的步伐。

9 月 23 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转引自王年一书）

在毛泽东一系列批孔和尊法扬秦言论的鼓舞下，江青指使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成立“大批判组”，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撰写批孔文章。经毛批准，中共中央于 1 月 18 日将《林彪与孔孟之道》转发全党。“批林批孔”运动迅即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

从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以来，写文章批孔已经是家常便饭，不

秦呢？直接的诱因，是林彪集团的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有这样一段话：

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予的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为当代的秦始皇。

他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名，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对林彪集团的攻击，毛泽东不是反驳，而是打收条，并又举而扬之。为此，对毛与秦更有进行一番对比研究的必要。

{ewc MVIMAGE,MVIMAGE,!09101200\_00189\_1.bmp}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同秦始皇的封建阶级专政，阶级基础截然不同。但两人都是一定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开创者，他们的功业，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就政体而言，两者都是高度集权的专政体制。就历史地位而言，秦始皇战胜六国，建立了中华民族统一的大帝国，反映着历史发展的进步要求；毛泽东通过长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统一，代表着社会变革的新方向。就思想体系而言，秦始皇钦服韩非，重用李斯，行法家之法，反对据古非今；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提倡“尊法批儒”，主张“厚今薄古”。

秦始皇最著名的暴政是“焚书坑儒”。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有战国时代的遗风，好议论时政。“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史记》卷 88，《李斯列传》）为了抑制非议，李斯建议采取专制手段，禁止私人讲学。除了博士官所藏图书和秦国史记以外，私人所藏儒家经典和诸子书一概送官府集中焚毁；下令后三十天不上缴所藏私书者，罚筑长城四年；聚谈诗书的人斩首示众，是古非今的人灭族。秦始皇听从李斯的建议，实行焚书法令。焚书的第二年，在秦始皇严命之下，秦御史对在咸阳的方士儒生进行了审问，并采用互相告密的办法，揭发出“为妖言以乱黔首”的儒生四百六十多人，将他们统统活埋在咸阳城郊。

早在 1958 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到“厚今薄古”时，就称赞秦始皇“以古非今者族”。林彪在旁插了一句：“秦始皇焚书坑儒”。毛泽东接着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人，我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个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的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毛泽东讲这番话正在 1957 年反右以后，反右一次就揪出 55 万个右派。迨至“文革”时期，被送进监狱、“牛棚”和下放改造的知识分子，更是多得不可胜数。当然，毛的策略是：保存肉体，改造灵魂。这一招比秦始皇高明得多。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其真实意图，既不在批判已经被打倒的林彪和孔子，也不是要为秦始皇做翻案文章。他主要着眼于解决对待“文革”的态度问题，即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一步肯定“文革”的理论和实践，防止“右倾翻案”，防止出“修正主义”。江青集团积极煽动“批林批孔”，其目的与毛有相同的一面，即要求进一步肯定“文革”，防止“右倾翻案”。也有不同的一面，即他们通过搞影射史学，塞进了“批周公”的私货，妄图从乱中夺权。毛泽东既鼓励江青一伙推动“批林批孔”，又不允许他们“迫不及待”地夺取最高权力。为此，运动一波三折，恍惚迷离。直到 1974 年底，江青“组阁”阴谋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运动遂戛然而止。

{ewc MVIMAGE,MVIMAGE,!09101200\_00191\_1.bmp}



但“批林批孔”余波未息，评《水浒》之风又起。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军委的讲话中提出：“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当时，他为了要肯定“文革”的成果，已在发动批林批孔，反对“复旧”。同时，又对各军区司令员进行大调动，防止在“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中占主导地位的军队干部拥军自重，雄踞一方。他所说的“接受招安”、“出修正主义”都是指否定“文革”的倾向而言，与批林批孔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

1974年四届人大召开以后，批林批孔已告一段落。但党内外对“文革”的态度，仍然存在着分歧，这个问题始终是毛泽东无时或释的一块“心病”。1975年8月13日，毛在同奉陪诵读古诗词的北大中文系教师芦荻谈话时说：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游》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20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8月14日，芦荻将毛有关《水浒》的谈话整理成文，送姚文元看。当日，姚文元如获至宝，立即给毛写信说：关于《水浒》的评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中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信未提出了几条具体措施：“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刷和评论的工作。我还看到了一种专供儿童青年读的《水浒》，是根据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写前言，增印鲁迅的话，否则流毒青少年。三、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个计划。”毛泽东批准了姚文元的请示信。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评论。从此，依据毛泽东的旨意而写作的评《水浒》文章，便连篇累牍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有的还塞进了“四人帮”的私货，以批投降派为名，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1975年9月20日，身患绝症的周恩来进入手术室时，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即此可见，评《水浒》对他的压力是何等沉重！毛泽东喜欢讲“两点论”，他经常说：“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文革”后期的评《水浒》，主要是从防止否定“文革”的需要出发，看到它的反面。但在此以前的几十年时间里，则主要是看它的正面。甚至可以说，毛的一生事业都与梁山英雄的造反精神分不开。少年时代，他就好读《水浒》，崇拜那些上山扎寨的绿林豪杰。1917年中秋节在湖南一师的后山上与青年朋友们讨论救国之道，毛泽东提出的办法

地的中国式革命道路。1944年1月，《逼上梁山》在延安平剧院上演，他带着兴奋的心情写信给编导杨绍萱、齐燕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都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1949年革命胜利以后，不但旧剧舞台变了，整个中国政治舞台也变了，毛泽东成了新中国政治舞台的主角。但他感到头十七年演出的第一幕缺乏新意。“文革”是别开生面的第二幕，以闹剧开始，以悲剧结束。帷幕未落，已群情佛然。1975年评《水浒》的视角转向于批判投降派，是他料到身后将会出现否定“文革”的“右倾翻案”、“修正主义”或“投降主义”，先下手打一次预防针。

《醒世恒言》中有一首诗：“世事纷纷一局棋，输赢未定两争持；须臾局罢棋收去，毕竟谁赢谁是输。”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溘然长逝。“文革”局罢棋收，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 主要参考书目

1. 《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2.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3.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4. 《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6. 《西行漫记》，[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
7. 《杨昌济文集》，王兴国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8. 《达化斋日记》，杨昌济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9. 《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李锐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0.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等著，三联书店1986年版。
11. 《晚年毛泽东》，萧延中编，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
12. 《毛主席的文化性格》，陈晋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
13. 《毛泽东读史》，张贻玖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
14. 《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 《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湖南出版社 1990 年版。
2.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
3.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4. 《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5.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6. 《西行漫记》，[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三联书店 1979 年版。
7. 《杨昌济文集》，王兴国编，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3 年版。
8. 《达化斋日记》，杨昌济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
9. 《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李锐著，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10.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等著，三联书店 1986 年版。
11. 《晚年毛泽东》，萧延中编，春秋出版社 1989 年版。
12. 《毛主席的文化性格》，陈晋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1 年版。
13. 《毛泽东读史》，张贻玖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1 年版。
14. 《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